

大英圖書館藏《漢語筭記》原始稿本 與稿本數量、流傳和內容*

柯保羅**

香港大學歷史系

摘 要

法國耶穌會士馬若瑟 (Joseph Prémare, 1666-1736) 在十七世紀末抵達中國，開始傳道；十八世紀初被清廷流放於廣州時，撰寫了《漢語筭記》(*Notitia linguæ sinicæ*) 一書，希望透過它幫助洋人學習漢語。此書完成後，馬氏將稿本寄回巴黎，請傅爾蒙 (Étienne Fourmont, 1683-1745) 替他在歐洲刊行。可惜所托非人，出版願望要在一個世紀後才得以在亞洲實現。近年來中外學者對《漢語筭記》的不同稿本和刊本頗感興趣，在此課題的各個範疇裡發表了不少文章甚至專著，補充早年主要出自外國漢學家相當豐富的論述。根據相關的一手和二手資料，本文首先重新梳理第一份原始稿本的背景歷史，然後審閱現藏於大英圖書館的另一份原始稿本，並就稿本數量、流傳歷史及稿本內容的幾個問題，提出一些發現和觀點，充實或修改現有著作在這些方面的結論。

關鍵詞：馬若瑟，《漢語筭記》，傅爾蒙，雷慕沙，蒙輓，稿本研究

* 兩位匿名審稿人曾對本文初稿提供了不少的寶貴意見，筆者想藉此機會表達衷心的謝忱。

** 旅歐獨立學者，兼任香港大學歷史系 Affiliate Assistant Professor，電子郵件信箱：p.kua@oxon.org

一、引言

馬若瑟 (Joseph Henri Marie de Prémare, 1666-1736) 在 1666 年 7 月 17 日出生於法國瑟堡 (Cherbourg)，1683 年 9 月 17 日加入耶穌會。1698 年 3 月 7 日，已三十多歲的他才從拉羅謝爾 (La Rochelle) 啟程，「航海仰東」，前往中國。¹ 馬氏乘坐的船隻經馬六甲、上川島和澳門等地，「歷八月航行」，在 11 月 6 日抵達「比巴黎更大，且至少有同樣多人口」的廣州。² 馬若瑟自此開展了他三十餘年之傳教事業，主要在江西工作。康熙禁教時馬氏倖免於難，但 1724 年雍正更嚴厲地執行教禁時，他被流放至廣州，1732 年再被驅趕至澳門。馬若瑟於 1736 年 9 月在葡屬澳門鬱鬱而終，一生無法重新踏足中國宣教。

馬若瑟入華時完全不諳中文，唯有「再反孩提之童蒙」，從頭學習語言。³ 但經多年「廢養忘寢，誦讀不輟」後，⁴ 他在宣教之餘，將《趙氏孤兒》全本及《書經》等部分譯成法文，更以中文撰寫了《六書實義》、《儒教實義》和《經傳眾說》等著作。不過，很多學者認為《漢語筭記》(*Notitia linguæ sinicæ*) 方係其曠世巨作。⁵ 馬若瑟最早之「伯樂」法國漢學家雷慕沙 (Jean-Pierre Abel-Rémusat, 1788-1832) 在 1829 年聲稱該書「是他最傑出最重要之著作，毫無疑問也是迄今為止歐洲人在這方面最好之作品」。⁶ 近代華人學者莫東寅在 1949 年出版的《漢學發達史》裡聲稱「馬氏一代大著，厥為《中國語札記》，正確傳中國語之性質構造於歐人之最初專書也。」⁷ 何群雄在 2002 年編輯的《漢語筭記》日本重刊本裡則表明

¹ 馬若瑟，《經傳議論》（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稿本，MS Chinois 7164），〈作者自序〉，頁 1。

² (Y. M. M. Querboeuf), Lettre, Prémare à Chaise, Canton, 17 Feb. 1699, in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Nouvelle édition: Mémoires de la Chine*, vol. 16 (Toulouse: Noël-Étienne Sens, 1810), p. 334. 除直接引用他人譯文外，外文資料之中譯由筆者提供，且會盡量意譯而非直譯。如引用資料罕見、原文複雜難譯或有其他需要時，正本或註腳會引述（關鍵）原文字句以供參考。

³ 馬若瑟，《經傳議論》，〈作者自序〉，頁 1。

⁴ 同前引，頁 3。

⁵ 注意馬氏原始稿本只有拉丁文書名，《漢語筭記》乃後來研究者的通用譯名。

⁶ Jean-Pierre Abel-Rémusat, *Nouveaux mélanges asiatiques*, vol. 2 (Paris: Schubart et Heideloff, 1829), p. 269.

⁷ 莫東寅，《漢學發達史》（北京：文化出版社，1949），頁 82。「筭」與「札」兩字相通。

雖經費有限，在挑選重印漢語經典時，「主編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此書」。⁸

傅爾蒙 (Étienne Fourmont, 1683-1745) 在十八世紀初與馬若瑟交往甚密，其文獻提供大量重要史料。雷慕沙於十九世紀初重新發現《漢語筭記》原始稿本，其著作亦有許多相關資料。考狄 (Henri Cordier, 1849-1925) 編撰的《中國書目》(*Bibliotheca sinica*) 深入研究《漢語筭記》之各種稿本和刊本，資訊詳盡，多年來被奉為這個著作最權威的參考書。⁹ 現代學者對馬氏及其語法書亦頗感興趣，先後發表了相當數量涉及稿本研究、流傳歷史、語言學、修辭學、索隱思想和語言習得觀等的論述。龍伯格 (Knud Lundbæk, 1912-1995) 和李真刊行的幾種文章和專作，是近年來對馬若瑟和《漢語筭記》較全面的學術論述。¹⁰ 馬若瑟的《漢語筭記》可以說是十九世紀歐洲知識分子中極重要的中國語文書，對不少漢學家、傳道者、外交官和其他西方有識之士有相當大的影響。筆者無意對該書作全面探討，只會以新的視角細心審視現存於大英圖書館編號 O/C ADD. 11707 的這份《漢語筭記》原始稿本（下文簡稱為「英圖原稿」或英圖館藏本）。¹¹ 本文將配合其他史料，從幾方面探討該書原稿的歷史、數量、流傳及內容等問題，提出一些補充，或不同於現有學術研究的結論及觀點。在本文裡，原始稿本的定義是作者親自撰寫的原稿，及由他指定的抄者抄寫的抄本。換句話說，後世根據原稿複製的抄本並非原始稿本，它們當然有研究價值，但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¹²

⁸ 何群雄編，《J. プレマールおよびその『中国語ノート』》（東京：三元社，2002），頁 302。原文：「編者は迷わず本書を選んだのである」。

⁹ Henri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à l'Empire chinois*, vol. 3, fasc. 1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e & Américaine, 1906), columns 1664-1669. 此書多被譯為《西人論中國書目》，與原書名不完全相符，本文簡稱為《中國書目》。該書並無頁數，但每頁有兩欄，均附有編號。

¹⁰ Knud Lundbæk, *Joseph de Prémare, 1666-1736, S.J.: Chinese Philology and Figurism* (Aarhus: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1991); 李真，《馬若瑟《漢語筭記》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18世紀來華傳教士對中國古代修辭學的傳播——以馬若瑟《漢語筭記》為例〉，《北京行政學院學報》，5（北京：2017），頁 121-128；〈馬若瑟 (Joseph de Prémare, S.J.): 生平、拉丁語漢語語法書及學術成就鉤沉〉，《拉丁語言文化研究》，1（北京：2013），頁 58-101；〈馬若瑟語言研究代表作《漢語筭記》之版本流變考〉，《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北京：2013），頁 118-123。

¹¹ Joseph Prémare,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Canton: c. 1728) (London: British Library, O/C ADD. 11707).

¹² 注意大英圖書館亦藏有一份編號 O/C ADD. 11708 的《漢語筭記》稿本，這是一份十八世紀的重抄本。

二、馬若瑟寄給傅爾蒙的《漢語筭記》原始稿本

本節透過一手資料按時間先後重新梳理第一份《漢語筭記》原始稿本的歷史，包括馬若瑟寫書的背景及把稿本寄給傅爾蒙請他代行出版的經過，同時修正一些現有論述的誤解。

作為入華傳教士，馬氏修習漢語的最終目的當然是傳道。要達到這個目的，照理說他只需學習簡單白話，不必研究深奧的古文。不過馬氏和他的老師白晉 (Joachim Bouvet, 1656-1730) 均為所謂索隱派 (figurism) 之信奉者，他們認為兩者都必須諳熟，才能有效地宣教。多年來，馬若瑟潛心鑽研儒家經典，努力闡釋中國文化與天主教教義之間或大或小的相通之處。他的中文著作，如研究字學的《六書實義》、引經據典的《儒教實義》以至章回小說《儒交信》等，均透過不同形式來托喻索隱和彰顯教義。此做法無疑秉承了耶穌會先賢利瑪竇等人容納及適應中華文化的傳統。同樣重要地，它亦進一步發掘出古籍內與天主教教義符合的概念，反過來促進中華文化容納並適應天主教，鼓勵國人接受洋教。

且不論馬氏索隱解經的努力是否卓有成效，他在此過程中卻掌握了儒家經典裡用字行文的秘訣，使他的中文造詣遠勝於其他同時代的來華傳教士，遑論遠在歐洲，只能「隔山打牛」式地學習漢語的所謂漢學家。換句話說，他應係那個年代最有資格寫書介紹漢語，以促進東學西漸的歐洲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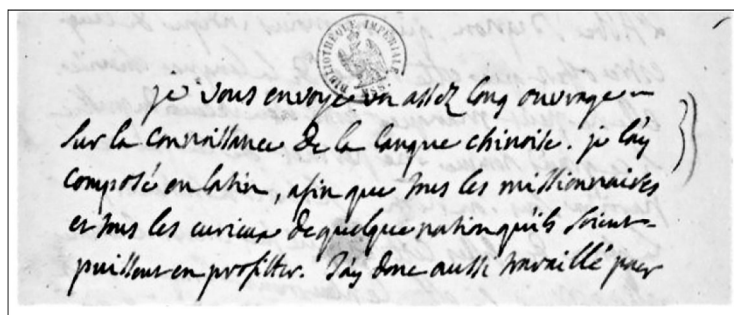
當然，資格還要加上動機才會催生結果。用拉丁文和中文寫成的《漢語筭記》的目標讀者，主要是有志來華宣教者和極少數的歐洲知識分子。所以，對馬若瑟來說，撰寫《漢語筭記》的動機仍然是宣教，甚至可以說是他被流放邊陲，不能直接傳道而選擇的間接事工。他曾對傅爾蒙說：

我奉上……我所有……著作背後最終目的是，若然可以，我務求使所有人都知道基督宗教與世界同樣古老，而神人肯定曾為發明中國象形文字及撰寫傳統經書者所知；親愛的，這是我過去三十多年來保持生氣和不懈努力學習之唯一動機 (l'unique motif)。¹³

¹³ Jean-Pierre Abel-Rémusat, *Nouveaux mélanges asiatiques*, vol. 2, p. 266. 「神人」(le Dieu-

馬若瑟在 1724 年已被流放廣州，而此書則大約在他被清廷「禁足」四年後完成。他沒有告訴我們撰寫《漢語筭記》的過程，但該書包含許多實例，顯示他早年肯定花了不少時間，累積來自日常生活和經史子集裡的大量條目。這個時期馬若瑟和傅爾蒙一直有書信往來，視他為歐洲學術界裡的好朋友。在 1728 年 10 月 20 日的信裡（圖一），前者告訴後者：

我要給您寄發一本關於漢語知識而篇幅頗長之著作。此書我用拉丁文撰寫，以便所有國家的傳教士和其他好奇者想的話都可以從中得益。我亦為您而做此事，這種反思使我喜愛我的工作……。¹⁴



圖一：馬若瑟 1728 年 10 月 20 日致傅爾蒙的信（部分）

馬氏委托傅爾蒙替他刊行此書，表示希望把它獻給負責巴黎皇家圖書館 (Bibliothèque du Roi) 的畢農 (Jean-Paul Bignon, 1662-1743)，因為「我沒有比《漢語筭記》更好的東西可以獻給他」，又說如果畢氏在稿本抵達後已不幸離世，他希望把書獻給皇家金石與美文學院 (Académie royal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homme/θεάνθρωπος/*deus homo*) 在基督教裡是指道成肉身的耶穌。

¹⁴ Joseph Prémare, Lettre, Prémare à Fourmont, 20 Oct. 1728, in *Correspondance du R. P. Joseph-Henri de Prémare, missionnaire jésuite en Chine, et de l'abbé Jean-Paul Bignon, bibliothécaire du roi, avec Fourmont l'aîné, professeur au Collège royal*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MS Français 15195), p. 32. 原文：“Je vous envoie un assez long ouvrage sur la connoissance de la langue chinoise. Je l'ay composé en latin, afin que tous les missionnaires et tous les curieux de quelque nation qu'ils soient, puissent en profiter. J'ay donc aussi travaillé pour vous, cette reflexion me fait aimer mon travail; ...”. 英譯可參 Knud Lundbæk, *Joseph de Prémare, 1666-1736, S.J.*, pp. 37-38. 可惜該書不附原文，無法一窺原貌，但起碼可免掉我們辨認馬氏有時頗為潦草難讀的法文書信原稿之苦，下一個引用即採自此英譯本。

他告訴傅氏出版此稿本會是件美事，因為「您會幫助一切有志於拯救華人者，和其他像您那樣，希望學好這門符號科學〔指中文〕以便研究中文書籍之人」。¹⁵ 最後，馬若瑟在信裡附上兩封獻詞供傅爾蒙選用。

當年書信往來費時，馬氏的信在 1729 年 9 月才寄達，足足花了近一年的時間。傅氏聲稱他收到信後很擔心，跑去諮詢畢農的意見，因為不久前他才完成了一本漢語書的初稿，正沉醉於將會「成為首位在歐洲撰寫中文語法書者之榮耀」。馬氏的著作使他吃驚，因為畢竟前者入華多年，「他精通該〔國〕語言」(il en possede la Langue en perfection)，比自己更有資格撰寫這樣的書。¹⁶ 充滿智慧且樂於助人的畢農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案，就是讓傅氏將他的手稿存放在皇家圖書館裡，然後等馬氏的稿本寄到時，再把兩者拿出來比較。傅爾蒙很高興地接受了這個建議，並於 1729 年 9 月 14 日交出稿本由畢農簽收。

馬若瑟在 1728 年 12 月 4 日和 10 日寫的信裡列出了打算托該年駛往歐洲的最後船隻運送的書籍和手稿，包括《漢語筭記》的原稿。同月 17 日的通訊則告訴傅氏說「我在最後的包裹中附上三位作者對我的筭記之同意書；這是有用的，因為三位支持者的價值要比一位高」。¹⁷ 這三封耶穌會的審閱批准書分別由郭中傳 (Jean-Alexis de Gollet, 1664-1741)、孟正氣 (Jean Domenge, 1666-1735) 和聶若翰 (François-Jean Noël, 1669-1740) 於 1728 年 4 月 12 日、8 月 2 日和 12 月 12 日撰寫，全部由赫蒼壁 (Julien-Placide Hervieu, 1671-1746) 於 12 月 16 日副署證明，剛好趕上船期。

裝有《漢語筭記》等手稿和其他書籍的盒子於 1730 年初抵達巴黎，傅氏和畢氏分別於 1730 年 2 月 4 日和 20 日簽署了兩封信函，見證手稿比較的完成。1731 年出版的《傅爾蒙先生著作目錄》(*Catalogue des ouvrages de Monsieur Fourmont l'ainé*，後文簡稱《著作目錄》)裡複印了傅氏的文稿比較信，說馬氏的文稿「在 1730 年 2 月 11 日寄達皇家圖書館」，考狄亦引用了類似的文字，聲稱寄達的日子為 2 月 11 日。¹⁸ 但這日期明顯是錯的——文稿一定是在 2 月 4 日之前收到的，因

¹⁵ Knud Lundbæk, *Joseph de Prémare, 1666-1736, S.J.*, p. 37.

¹⁶ Étienne Fourmont, *Catalogue des ouvrages de Monsieur Fourmont l'ainé* (Amsterdam: publisher unknown, 1731), pp. 101-102.

¹⁷ Joseph Prémare, Lettre, Prémare à Fourmont, 17 Dec. 1728, in *Correspondance du R. P. Joseph-Henri de Prémare...et de l'abbé Jean-Paul Bignon...*, p. 38. 原文：“Je joins à ce dernier paquets les approbations des trois scribeurs de ma notice chinoise; cela ne sera pas inutile, car trois soutisseurs valent mieux qu'un...”.

¹⁸ Étienne Fourmont, *Catalogue des ouvrages de Monsieur Fourmont l'ainé*, pp. 109, 116. 頁 109 原文：

為傅氏在該日已經完成比較並簽發信件。

幸好法國國家圖書館現在仍藏有傅氏的文稿比較信，此手稿寫明「裝滿中文書籍的箱子……終於在 1730 年 1 月 11 日寄達皇家圖書館」，¹⁹ 這應該才是稿本寄達的正確日期。我們無法確定《著作目錄》裡的日期是傅氏寫錯，或是印刷時的手民之誤，但起碼解決了傅爾蒙和考狄著作裡的這個邏輯問題。²⁰ 龍伯格沒有採用傅爾蒙和考狄的日期，只聲稱手稿抵達的日期是 1 月 11 日，李真跟隨了此講法，不過兩人在書裡都沒有標明日期的出處，相信龍伯格看過上述所提及的信件手稿。

傅爾蒙從開始就嚴厲地批評《漢語彙記》，指出它的種種不是，間接阻礙了手稿的出版。他曾告訴馬若瑟一些他並無指名道姓的「批評者」的意見，說他們認為「您的方法並不精確」(*votre méthode n'est pas exacte*)。²¹ 在 2 月 4 日的信函中，傅氏表明自己的語法書比較優越和適合歐洲人使用。他甚至聲稱在《漢語彙記》裡「根本找不到屬於中文語法的片言隻語」，說它雖「有許多好的實例」，卻「是一本論述虛詞的專作多於一本語法書」(*est plutôt un Traité des Particules qu'une Grammaire*)。²²

話說回來，就算傅氏真心想出版《漢語彙記》，當時至少仍有一個實際的障礙。馬氏堅信只能「通過練習而不能從理論研究來學好中文」，因此手稿有「接近一萬二千個例子和五萬個漢字」。²³ 所以，要在歐洲出版此書就必須鑄造大量的中文銅字，刊行的成本將會十分高昂。馬若瑟曾考慮過這個問題，並在 1730 年 11

“La caisse de livres Chinois...étant enfin arrivée à la Bibliothèque du Roy le 11. Fevrier 1730”; Henri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vol. 3, fasc. 1, column 1664. 原文：“...il est arrivé à la Bibliothèque du Roy le 11. février 1730.”

¹⁹ Étienne Fourmont, “Copie de la letter de M. Fourmont l’ainé à Monsieur l’Abbé Bignon du Samedy, 4. Fevrier 1730,” in Étienne Fourmont et al., *Papiers d’Étienne, Michel et Claude-Louis Fourmont*, vol. 31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NAF 8974), pp. 33-35. 此稿本文檔有一系列的文件，並無統一編頁。原文：“La caisse de livres Chinois...étant enfin arrivée à la Bibliothèque du Roy le 11. Janvier 1730”.

²⁰ Knud Lundbæk, *Joseph de Prémare, 1666-1736, S.J.*, p. 40; 李真，《馬若瑟《漢語彙記》研究》，頁 74。

²¹ Jean-Pierre Abel-Rémusat,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auctore P. Premare,” *Journal des Savants* (Sep. 1831), pp. 541-542.

²² Étienne Fourmont, *Catalogue des ouvrages de Monsieur Fourmont l’ainé*, pp. 112, 113. 原文 *Particulis* 可被直譯為助詞，但在書裡馬若瑟經常把它泛指包括助詞的各種虛詞（例如用作副詞的「太」、連詞的「又」、介詞的「為」字）等，所以本文把它意譯為虛詞。

²³ S. R. (sic), “Biographical Notice of Père Joseph Prémare, Translated from Rémusat’s *Nouveaux mélanges asiatique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0.12 (1841), p. 672.

月 1 日給傅爾蒙的信裡介紹中國的雕版印刷技術，更提出兩地合作，「在巴黎找一位寫得一手好字的人用薄紙寫上我稿本裡的拉丁文」，把紙稿寄回中國，再在當地填上中文，並雕版刊行。他又說，「這樣一來，你希望有多少個刊本我都可以盡量提供」。²⁴ 傅爾蒙顯然對上述建議不太熱衷，馬若瑟在後來的信裡也沒有再提起這個做法，此事亦不了了之。

馬若瑟很關心出版的進度，數次致函傅氏提及此書。在 1731 年 8 月 30 日的信裡他顯然對出版仍抱著一線希望，埋怨說「您忘記告訴我關於寫給畢農先生和您的皇家學院那兩份信函」的情況，請傅氏在印書時要決定採用其中的一份獻詞。²⁵ 在這裡馬氏雖沒有直接問及著作的刊行，他的意思卻已不言而喻，傅爾蒙是不可能不明白的。

1733 年年底，亦即馬若瑟被清廷驅往澳門居住的翌年，他收到一本《著作目錄》，終於看見裡面重刊了的稿本比較信函。相信到了此時，他才徹底失望，明白傅氏並非他的同道中人，按現代說法更可能是個有「隱藏議程」(hidden agenda)者，根本不會替他出版《漢語彙記》。在 10 月 5 日的回信裡，馬若瑟在字裡行間都表露出失望和不滿，甚至不惜冷嘲熱諷，顯然已不再把傅氏視為朋友。柯恆儒(Heinrich Julius Klaproth, 1783-1835) 曾取得此信函的抄本並把它刊行，下面是較精彩的一段：

我已收到你的《著作目錄》……我只能判斷那些與中文有關的東西，也只會告訴你一個人我對它們的看法，因為我與你交情太深 (je ne le dirai qu'à vous seul; je suis trop votre ami pour autrement)。你和我工作目的相當不同。對我來說，我只是想使漢語學習變得輕鬆愉快。對你來說，你似乎是想趕走並嚇壞人們。如果我在巴黎，用我的《漢語彙記》，應該只需要三到四年就可以教會人們說中文，讀中文書及寫中文，甚至〔文言文〕文章。但用你大開本語法書裡所有的論述，和只有你才能想像出和撰寫的所有詞典 (et tous ces dictionnaires que vous pouvez seul imaginer et exécuter)，我懷疑十年之內是否有人能夠閱讀和理解孔夫子的《四

²⁴ Knud Lundbæk, *Joseph de Prémare, 1666-1736, S.J.*, p. 47. 早在 1662 年，同屬耶穌會的殷鐸澤 (Prospero Intorcetta) 就曾在中國用雕版印刷刊行了拉丁文和中文的《四書》(*Sapientia Sinica*)，馬若瑟有可能看過此書，但他在信裡並沒有提及殷鐸澤。

²⁵ Joseph Prémare, *Lettre, Prémare à Fourmont*, 30 Aug. 1731, in *Correspondance du R. P. Joseph-Henri de Prémare...et de l'abbé Jean-Paul Bignon...*, p. 54.

書》。²⁶

翌日馬若瑟再寫了一封信給傅爾蒙，只提及由皇家圖書館托付代購的二百多冊書籍，沒有片言隻字提及自己的書。終其一生，再也不曾與傅氏通訊。

馬若瑟晚年生活拮据，曾向皇家圖書館的畢農求助。而且，馬氏的健康亦每況愈下，1731 年曾三度中風，可能導致他身體癱瘓，據說是因為「他對漢學研究投入過度的熱忱」(*trop grande ardeur avec laquelle il s'était livré à l'étude du chinois*)。²⁷再者，所謂禍不單行，馬氏與索隱有關的言論也被一些人視為離經叛道之說，數度引起羅馬教廷少數人的不滿。1736 年 10 月，他再次被批評並被勒令返回歐洲，面對教廷的審查。但在 1736 年 9 月，亦即傳召信發出前的一個月，他已於澳門安息主懷，最終避過了需要在晚年長途跋涉面對教會審判之苦。

根據當時文獻裡的蛛絲馬跡，龍伯格曾對傅氏致馬若瑟的兩封信提出嚴重的質疑。第一，他認為馬若瑟根本從來沒有看過傅爾蒙 1730 年 2 月 4 日寫的文稿比較信。龍氏指出傅爾蒙「把它〔指文稿比較信〕印在 1737 年，亦即馬氏逝世一年後才出版的《漢語論稿》(*Meditationes Sinicae*) 裡」，而且「沒有證據」顯示畢氏曾把副本寄給他。若然馬氏真的收到這份文稿比較，龍伯格問，「他怎麼可能不回應傅爾蒙關於《漢語彙記》無用的評論」呢？²⁸

龍伯格對傅氏的這個指控是不正確的。在 1737 年出版的《漢語論稿》裡的確刊印了文稿比較信，但如上所述，在 1731 年出版的《著作目錄》裡，傅爾蒙首次收錄了這份重要的文獻。²⁹馬氏在 1733 年 10 月 5 日的信裡表明他收到並看過《著作目錄》，且作了回應。《著作目錄》是一本才一百多頁的書，馬若瑟不可能看了書裡大部分與自己無關的內容，卻沒看到印在第 109 至 121 頁，與自己有關的手稿比較信函及證明信！龍伯格顯然忘記了《著作目錄》裡發表的這兩封信，才會得出馬氏沒有看過文稿比較的推論。馬若瑟在 1733 年 10 月 5 日的信裡沒有爭辯到底他的著作是否無用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當時身心皆疲，而且已對傅氏死心，應該是覺得沒有必要再浪費唇舌。

²⁶ M. L. Aimé-Martin (ed.),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concernant l'Asie, l'Afrique et l'Amérique*, vol. 3, *Chine* (Paris: Panthéon, 1838), pp. 839-841.

²⁷ Jean-Pierre Abel-Rémusat, *Nouveaux mélanges asiatiques*, vol. 2, p. 275.

²⁸ Knud Lundbæk, *Joseph de Prémare, 1666-1736, S.J.*, p. 103.

²⁹ Étienne Fourmont, *Catalogue des ouvrages de Monsieur Fourmont l'ainé*, pp. 109-115; *Meditationes Sinicae* (Paris: Lutetiae Parisiorum, 1737), pp. 136-137.

第二，龍伯格認為 1732 年致馬氏的「信函」根本是傅爾蒙後來假造的，所以當然馬若瑟亦沒有看過。在這封聲稱寄給馬若瑟、用拉丁文撰寫的信裡，傅氏詳盡地闡述馬氏手稿裡的各種缺點，更表明他如此做「不過是服從您的命令」(*non nisi dicto tuo obediens*)。³⁰ 龍氏指出該信只曾在《中國官話》(*Linguae Sinarum mandarinicae*, 1742) 裡出現，可能根本不是「真實的信件」，而是「在 1742 年，亦即馬氏去世後六年」才由傅氏杜撰的。³¹ 再說，如果傅爾蒙真的把 1732 年的信寄給在澳門的馬若瑟的話，即便馬氏在 1733 年 10 月 5 日回信時可能還沒有收到該信，1734 年也應該收到，「馬氏仍然有兩年時間去回應，但顯然他沒有」。³² 龍伯格認為馬若瑟一向積極為自己辯護，不可能在收到如此嚴厲的批評後仍然保持沉默。

龍氏這第二個指控不能說是完全錯誤，但起碼也是可以商榷的。對於 1732 年的「信函」是否為傅氏在 1742 年才事後杜撰的，大家當然可以質疑，不少研究者包括本文作者均認為這個可能性頗高。但重點是即使 1732 年這第二封所謂「信函」是真的，而馬若瑟的確也曾在大約 1734 年前後收到它，考慮他晚年對傅爾蒙的看法和面對的種種困難，他選擇不回應辯白並不稀奇。

雷慕沙、考狄和其他人都說傅爾蒙曾抄襲馬若瑟，也有些學者覺得他是清白的。傅氏可能真的曾犯下剽竊他人這種英國詩人約翰遜所說的「最可恥之……文學罪行」(*most reproachful...of literary crimes*)，³³ 但他無疑地也下了許多功夫，期望後世無人會如此指控他。無論如何，正如雷慕沙所說，《漢語彙記》的原稿在寄給傅爾蒙後「就一直被遺忘」(*étoit restée dans l'oubli*)。³⁴ 但在馬氏去世後，傅氏卻出版了好幾本中文語法的著作，包括獻給畢農的《漢語論稿》和獻給法國皇帝路易十五世的《中國官話》。這些作品使傅氏儼然成為當時歐洲的漢語專家，但亦無可厚非地引起了後人的詬病，懷疑他曾剽竊馬若瑟、萬濟國 (Francisco Varo) 和黃嘉略 (Arcade Hoang) 等人之作品。

³⁰ Étienne Fourmont, *Linguae Sinarum mandarinicae hieroglyphicae grammatica duplex, latinè, & cum characteribus Sinensium* (Paris: Lutetiae Parisiorum, 1742), "Præfatio," p. xvij.

³¹ Knud Lundbæk, *Joseph de Prémare, 1666-1736, S.J.*, p. 103.

³² Ibid.

³³ Samuel Johnson, *The Works of Samuel Johnson*, vol. 4 (Oxford: Talboys & Wheeler, 1825), p. 80.

³⁴ Jean-Pierre Abel-Rémusat,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auctore P. Premare," p. 537.

三、「英圖原稿」是否為馬若瑟寄給傅爾蒙的稿本？

《漢語彙記》有好幾份原始稿本或重抄本存世，所以討論本節的問題從邏輯上應該是兩個階段的分析。我們首先要確定「英圖原稿」到底是否為馬若瑟撰寫的原始稿本之一，然後才可以分析它是否為馬氏在 1728 年 12 月寄出，傅爾蒙在 1730 年 1 月透過皇家圖書館收到的那份原稿。第一階段的分析比較簡單，因為只需把「英圖原稿」與一份已知的馬氏手稿作比較，而現在學術界在這個問題上亦已經有了定論。第二階段的分析則比較複雜，因為我們手上沒有傅爾蒙的藏本，現有研究在這方面的論述也值得商榷。

在進行第一個階段的分析之前，需要介紹一下現在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編號 Chinois 9259 的《漢語彙記》的原始稿本（下文簡稱為「法圖原稿」或法圖館藏本）。³⁵ 傅爾蒙所藏的《漢語彙記》是最早寄達歐洲的文稿，可惜在傅氏逝世後長時間不知所蹤。幸好這並非馬氏的唯一手抄本——他最少還有另外一份原始稿本，即「法圖原稿」，應該是第二份抵達歐洲的稿本。

「法圖原稿」能夠在十九世紀初重新面世，我們要感謝雷慕沙。1811 年，當雷氏還是個 23 歲的醫科學生時，他就自學中文，更出版了一本題為《漢文簡要》(*Essai sur la langue et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s*) 的書。當時有學者認為只要有一本一萬字的中文字典，人們就可「遍覽歷代古籍」(*lire avec fruit les livres de toutes les dynasties*)。年紀輕輕的他卻有獨立的判斷，說「錢德明和馬若瑟等傳教士的中文造詣都很高，但他們當然不會是只靠一本有一萬個單詞的字典」，反映他已有較有深度的漢語習得觀。³⁶

雷慕沙兩年後完成醫科課程，於 1814 年被委任為法蘭西公學院 (Collège de France) 的首任漢滿語言及文學教授。雷氏透過傅爾蒙的著作得知他與馬氏交往的詳情，早就敬仰馬若瑟，希望能一窺《漢語彙記》的全貌。他深信此書可能有不只一份的原始稿本，因為當年的「傳教士通常會把送回歐洲之作品如此小心地處

³⁵ Joseph Prémare,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Canton: 1728)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MSS Orient. Chinois 9259).

³⁶ Jean-Pierre Abel-Rémusat, *Essai sur la langue et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s* (Paris: Treuttel et Wurtz, 1811), pp. 59, 124-125. 原文：「le P. Amyot, le P. Prémare, etc., qui s'étaient acquis une érudition chinoise immense, mais certainement ils ne l'auraient pas puisée dans un Dictionnaire de dix mille mots.»

理」。³⁷ 原來第二份原稿一直都藏在法國國家圖書館的前身巴黎皇家圖書館裡，只是多年來「失去蹤影」(fut perdu de vue)，連 1810 年的館員對稿本的存在也懵然不知。幸好皇天不負苦心人，雷慕沙在替圖書館編寫中文書籍目錄時，無意中於館內之「東方手稿專櫃」(Cabinet des Manuscrits orientaux) 裡把它發掘出來，使它得以重見天日。³⁸ 第二份《漢語彙記》原始稿本的存在非常重要，因為多年以來，大家都以為傅氏所藏的原稿已然淹沒，意味著馬若瑟的這本漢語著作永遠失傳。

雷慕沙估計「法圖原稿」應該是在傅爾蒙去世後才入藏皇家圖書館的，但未提供有關的證據。³⁹ 筆者認為這個推測是合理的，因為直到 1733 年 10 月，在巴黎仍然只有傅爾蒙手上的稿本，馬氏在信裡從未提過其他的稿本。如果他曾把另一份稿本寄往皇家圖書館，鑒於傅爾蒙與該館和畢農的關係，不可能不知會傅氏。接著幾年，他生活潦倒，倍受攻擊，既無心情亦無動機，應該也不會把第二份手稿寄去歐洲。

我們對「英圖原稿」的流傳歷史所知有限，稿本前方的加頁只標明它是「1840 年 4 月在巴黎的克拉普羅特〔藏品〕拍賣裡購得」的。克拉普羅特又名柯恆儒，他於 1783 年 10 月 11 日在德國柏林出生，於 1816 年被波恩大學委任為「德國首位東亞研究教授」。⁴⁰ 為了方便研究，他選擇長居巴黎，與雷慕沙同被視為歐洲的東亞研究界泰斗，對語言學、歷史學、民族學和東方學等均有貢獻。柯恆儒在 1835 年離世，該稿本數年後被公開拍賣，由大英博物館購入。1970 年代初，大英圖書館從大英博物館獨立出來，此稿本現在就存放在大英圖書館在倫敦的新館大樓。

現在學術界普遍肯定「法圖原稿」和「英圖原稿」這兩份稿本均是馬若瑟的原始稿本。柯恆儒的藏書目錄聲稱「手稿在華完成，被認為是馬若瑟神父之原始稿本」。⁴¹ 李真也說「從筆跡和編號的對照可以看出，大英圖書館所藏和法國國圖所藏兩份手稿均出自馬若瑟本人之手」。⁴²

《漢語彙記》有緒論 (Introductio)、關於白話文的第一部 (Pars Prima) 和講解

³⁷ Jean-Pierre Abel-Rémusat,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auctore P. Premare," p. 541.

³⁸ Jean-Pierre Abel-Rémusat, *Nouveaux mélanges asiatiques*, vol. 2, p. 272.

³⁹ Jean-Pierre Abel-Rémusat,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auctore P. Premare," p. 541.

⁴⁰ Hartmut Walravens, *Julius Klaproth (1783-1835), Leben und Werk*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1999), p. ix. 克拉普羅特後來很多作品均為法文書，經常以 Julius Klaproth 署名。

⁴¹ J. H. (Julius Heinrich) Klaproth, *Catalogue des livres imprimés, des manuscrits et des ouvrages chinois, tartares, japonais, etc., composant la bibliothèque de feu M. Klaproth* (Paris: R. Merlin, 1839), p. 49. 原文："Manuscrit exécuté en Chine et que l'on croit être l'original même du P. Premare".

⁴² 李真，《馬若瑟《漢語彙記》研究》，頁 93。

文言文的第二部 (*Pars Secunda*) 三大部，每部各有若干章 (*Caput*)，每章再細分為篇、段和號 (*Articulus, Paragraphus, Numerus*) 等。法圖館藏本和傅爾蒙藏本都有緒論、第一部和第二部，亦均附有三封審閱批准書及兩封出版獻詞。但它們的內容並非完全相同，最主要的分別是前者第一部只有兩章，但根據傅爾蒙的介紹，他的藏本的第一部則有論述中國禮節的第三章。「英圖原稿」則是殘本，欠缺緒論和第二部，只有關於白話文的第一部；和傅爾蒙藏本一樣，它的第一部同樣有講解中國禮節的第三章。換句話說，「法圖原稿」和「英圖原稿」能直接比較的只有第一部的第一和第二章。

兩份現存的原始稿本分別有兩套或三套並不完整的頁碼系列，中間可能回跳或前跳，比較混亂。「法圖原稿」的第一部有兩種頁碼，在此稱為系列 A 和系列 B。系列 A 從系列 B 的第 7 頁首次出現，在該頁已是第 52 頁，但在中間系列 A 又回頭跳了 10 頁（第 93 頁接下來是第 84 頁），導致在系列 B 的第 108 頁在系列 A 才只是第 141 頁。然後，下一頁開始的頁面只剩下系列 A 的頁碼，由第 142 頁到第 314 頁，即第一部第二章的尾頁。系列 B 的編碼由首頁亦即第 3 頁，至第 108 頁終結，但中間跳過了第 38、39 頁。系列 A 是舊的頁碼，在所有寫上兩個頁碼的頁面裡都曾被作者用與內文同樣的墨水筆跡劃掉，再加上系列 B 的頁碼。簡單地講，根據上述兩個系列頁碼的回跳或前跳調整後，「法圖原稿」的第一部總共有 277 頁。⁴³

「英圖原稿」的第一部有三種頁碼，加上了系列 C。系列 A 的頁碼以至回跳完全與「法圖原稿」的一樣，亦同樣全被作者劃掉，但並未出現在此稿本獨有的第三章裡。系列 B 在第一頁首次出現時，已是第 3 頁，第一部第二章尾頁則是第 280 頁，而第三章尾頁，即稿本最後一頁，是第 322 頁。換句話說，與「法圖原稿」不同，系列 B 在此稿本裡從頭到尾按順序出現，沒有跳過第 38、39 頁。系列 C 是用鉛筆寫上的跨頁 (*spread*) 編碼，基本上跟系列 B 平行，只是少了兩頁，從第 1 頁至第 320 頁，很可能是後期藏書者（疑為大英圖書館）的編號。總之，「英圖原稿」（只存第一部）共有 320 頁，比「法圖原稿」的第一部多出 43 頁，這是合理的，因為較後者多了第三章。

筆跡比較是藝術非科學，會受抄手不同年紀的風格、習慣和能力，以及抄寫時的目的、時間和對象等影響。但由於兩份原始稿本的人、地和時的因素都相同，這

⁴³ 第一部總頁數算法有二：第一，系列 B 頁數 ($104=108-2-2$) 加餘下的系列 A 頁數 ($173=314-141$) 共為 277 頁。第二，系列 A 的淨頁數加上前面 4 頁和回跳 10 頁 ($314-51+4+10=277$)。

些均無需考慮。馬若瑟的筆跡在兩份藏本裡都出現於稿本的起首幾頁，即系列 B 的第 3 至第 6 頁，從第 7 頁開始出現無名抄者的筆跡，然後在「英圖原稿」第 106 頁和「法圖原稿」第 108 頁（後者中間跳了兩頁），馬若瑟的筆跡重新出現，直到兩份藏本第一部第二章的結尾。「英圖原稿」獨有的第三章則全為馬氏手筆。換句話說，即使只考慮兩份稿本可比的第一部第一、二章，有超過六成頁面的文字是馬若瑟的筆跡。

當然，如果希望更加確定的話，我們亦可拿「英圖原稿」與一些其他已知的馬若瑟手稿相比較。上文引用了幾份現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的馬氏信函，包括他在 1728 年 10 月 20 日寄給傅爾蒙的信，這些都可以用來比照。在這些信函裡，我們發現無論是拉丁文或是法文，很多相同的字母均與「英圖原稿」裡馬若瑟的筆跡十分接近。柯恆儒曾經擁有馬氏在 1733 年 10 月 5 日寫的信，相信他可以做類似的對比。李真比較過馬氏附於「法圖原稿」和藏於梵蒂岡圖書館裡的親筆信及兩份原稿，同樣發覺「四份文獻的筆跡基本相同」。⁴⁴

總而言之，筆者同意柯恆儒和李真等人的看法，無論是從頁碼和筆跡的角度來分析，兩份現存的原始稿本十分接近，我們可以確定「英圖原稿」也是馬若瑟的原始稿本之一。

表一從「英圖原稿」的頁面裡複製分別由馬若瑟及無名抄者寫下的拉丁文和中文字句，以便讀者對照筆跡。馬若瑟的拉丁文筆跡獨特，比較奔放、瘦削且前傾，雖然有些寫得較潦草，有些則較工整。另外一種筆跡則明顯比較謹慎、圓方和垂直，應該是出自馬若瑟所雇用不太熟悉拉丁文的（華人）抄手。兩者的拉丁文風格相當不同，基本上在所有的文字裡都可以看得出，不過讀者可以特別注意“Articulus”的“A”及“s”，“Grammatica et Syntaxi”的“G”、“t”及“S”，“Linguae Sinicae/vulgaris”的“L”、“g”、“S”及“v”，“Primus”的“P”，及“loquendi modis”的“l”、“q”及兩個“d”。兩者的中文字之分別沒有那麼明顯，馬氏的中文也寫得不錯，但讀者仍然可以看得出有一些他寫的字整體佈局分配不太平均，例如「晚」字、「甚麼」兩字和「老」字，而「聰明」的「聰」字則顯然與傳統寫法不同。我們亦可參考前文馬氏 1728 年的信件（圖一）裡比較潦草的筆跡，注意“sur la connoissance”的“s”、“ss”和“de la langue”、“de quelque”、“donc”的“d”等。

⁴⁴ 李真，《馬若瑟《漢語筭記》研究》，頁 124。

表一：「英圖原稿」裡的兩種筆跡

馬若瑟筆跡	抄寫者筆跡
Articulus	Articulus
grammatica et syntaxi	Grammatica et Syntaxi
linguae sinicae	Linguae Sinicae
linguae vulgari	Linguae Vulgaris
Primus	Primus.
loquendi modis	loquendi modis
晚生	晚生
甚麼	甚麼
老爺	老爺
聰明	聰明

(來源：大英圖書館「英圖原稿」，Joseph Prémare,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 British Library Board, O/C ADD. 11707.)

在進行第二個階段的分析之前，我們需要回顧一下現在學界對「英圖原稿」的共識。到目前為止，研究者普遍認為英圖館藏本就是馬若瑟寄達傅爾蒙的原稿。不太懂中文的考狄一向很受漢學研究者敬重，他的《中國書目》曾被論者推崇為「到1921年為止，有關中國的七萬種西方語言作品（包括書籍和文章）的標準書目」。⁴⁵ 考狄編書常不遠千里地尋訪書籍和稿本，親自翻閱審視後才進行編寫。看過這本稿本後他的結論是：「相信我們可以說此稿本原屬傅爾蒙，而它從他的手上（〔不知〕如何？）傳到了柯恆儒的手裡」(Nous croyons pouvoir dire que ce ms. a appartenu à Fourmont et qu'il est passé de ses mains (comment?) entre celles de Klaproth)，然後由大英博物館購得。他的理據相當有說服力，就是此稿本內談中國禮節的第三章（系列B第281至322頁）。傅爾蒙說馬若瑟寄給他的稿本裡有這一章，但它卻不見於「法圖原稿」，所以考狄認為英圖館藏本「與曾在傅爾蒙手中的稿本之描述完全相符」(se rapporter exactement à la description de l'exemplaire qui était entre les mains de Fourmont)。⁴⁶

⁴⁵ Endymion Porter Wilkinson, *Chinese History: A Manual, Revised and Enlarg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0), p. 311.

⁴⁶ Henri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vol. 3, fasc. 1, column 1668.

李真同意考狄的結論，在一篇文章裡表示「英國藏本極有可能才是 1728 年寄給傅爾蒙的那份五卷本的殘本」；並在她的專著裡聲稱：

考狄亦曾查閱考證過大英圖書館的這份手稿，認為手稿中新增的內容應是馬若瑟原始五卷本手稿的一部分。筆者通過對該章的辨讀、轉寫和翻譯，發現英國藏本的情況確與傅爾蒙對自己手中持有的馬若瑟手稿描述十分接近。⁴⁷

這個結論邏輯上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如果「英圖原稿」果真是傅爾蒙藏本，為甚麼它沒有那三封審閱批准書和兩封出版獻詞呢？李真提出一個看來頗合理的假設：「由於英國本已經是一份殘稿，緒論部分和第二篇均已遺失，或可推測遺失的部分中有可能也同樣包括三份審閱鑒定書和兩封信件的抄本。」⁴⁸

總而言之，考狄和李真均認定英圖館藏本就是傅爾蒙藏本之殘本。換句話說，「法圖原稿」是後來寄給皇家圖書館的原始稿本（但此本沒有論述中國禮儀的第一部第三章），而「英圖原稿」則是當年馬若瑟寄給傅爾蒙的稿本之殘本。根據他們的結論，我們亦應該接受馬若瑟的原始稿本只有兩份的推論。

要證實馬若瑟曾經複製過兩份或三份原始稿本的徹底方法是比較傅爾蒙藏本和「英圖原稿」的內容。如果兩者完全一樣，考狄等人認為英圖館藏本就是傅爾蒙藏本的結論就可以確定。如果兩者確實不同，「英圖原稿」根本不是傅爾蒙藏本，那我們就可以肯定起初最少有三份原稿。這個解決方案邏輯上合理，實際上也有可能可行，因為我們手上有「英圖原稿」，雖然沒有傅爾蒙藏本，卻起碼有他關於此藏本的論述。

傅爾蒙在《中國官話》裡刊登的「信函」裡有介紹《漢語筭記》原始稿本之內容，所以我們對他的藏本有一定認識。這份文獻敘述詳細，占據該書開本頗大的頁面共八頁，但近代研究者包括考狄都沒有詳細參閱它的內容。考狄知悉《中國官話》的存在，並曾在《中國書目》裡簡單地介紹過此書。但他有可能是受了雷慕沙等人的影響，曾批評傅爾蒙「此人驕傲，虛榮和惡劣」(Cet homme...est...un type d'orgueil, de vanité et de mauvaise)。⁴⁹ 不知是否因為對傅氏的印象不好，他顯然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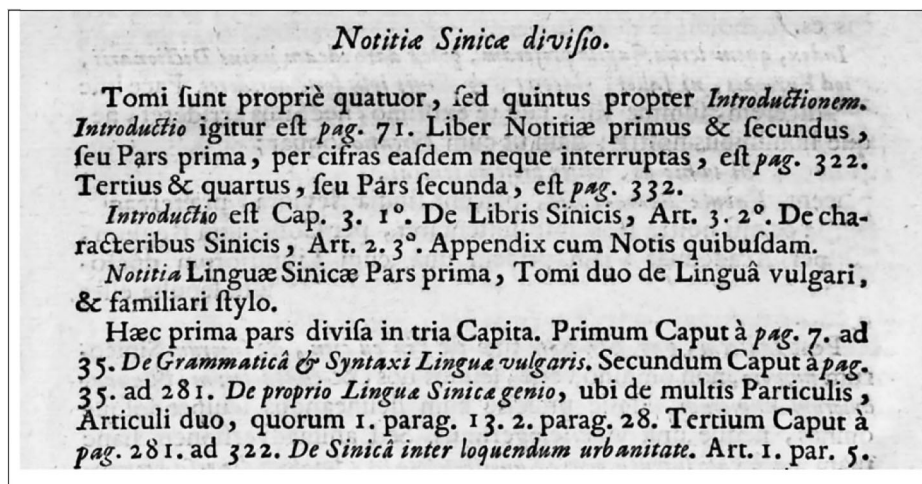
⁴⁷ 李真，〈馬若瑟語言研究代表作《漢語筭記》之版本流變考〉，頁 121；《馬若瑟《漢語筭記》研究》，頁 94。

⁴⁸ 李真，〈馬若瑟《漢語筭記》研究〉，頁 104-105。

⁴⁹ Henri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vol. 3, fasc. 1, column 1659.

曾仔細查閱過此書。

在《中國官話》裡傅氏說手上的《漢語彙記》「文本共四卷，和第五卷的緒論。緒論有 71 頁。彙記的第一和第二卷，或第一部，同樣連續的編號，共 322 頁。第三和第四卷，或第二部，是 232 頁」（圖二）。⁵⁰ 換句話說，如果五卷手稿果然如傅氏所說的沒有任何缺頁，則此稿本應該總共有 625 頁。緒論分三章，介紹中國經典、中文文字和韻母列表；關於白話文的第一部亦分三章，講解語法句法、虛詞用法和中國禮節；關於文言文的第二部則分五章，討論語法句法、虛詞用法、多種行文風格、修辭手法以及一系列成語和短句等。注意傅爾蒙明確講「這第一部分為三章……第三章從第 281 頁至第 322 頁，關於中國的交往禮節」（*Hæc prima pars divisa in tria Capita...Tertium Caput à pag. 281. ad 322. De Sinicâ interloquendum urbanitate*）。⁵¹



圖二：傅爾蒙《中國官話》裡《漢語彙記》的介紹（部分）

英圖館藏本只有介紹白話文的第一部含關於中國禮節的第三章。傅爾蒙藏本則是完整的，有緒論三章、第一部三章和第二部五章。本節下面的段落會詳細比較兩

⁵⁰ Étienne Fourmont, *Linguae Sinarum mandarinicae*, "Præfatio," p. xvij. 注意原文此段最後的數字是 322 頁，但這是手民之誤，因為同一頁下方分章頁數說明第二部末章尾頁是 232 頁，不是 322 頁。第二部 232 這個尾頁頁數也和法國國家圖書館現存的原始稿本相同。

⁵¹ Ibid.

個稿本的可比部分，亦即第一部共三章的文本。⁵² 在此，「英圖原稿」採用的是系列 B 的頁數，而傅爾蒙藏本的頁數則來自《中國官話》，兩者絕大多數相同，明顯是同一系列。這些段落的分析比較詳盡，沒有興趣深入研究兩個稿本各種分歧的讀者也可以考慮略過，直接參看表二的匯總。

第一部有幾頁前言（第 3-6 頁），然後就是從第 7 頁開始的第一章，題為「論白話文的語法和句法」(De Grammaticâ & Syntaxi Linguæ vulgaris)。「英圖原稿」和《中國官話》裡介紹的傅爾蒙藏本的內容幾乎沒有分別，但尾頁頁數不同——前者最後有字的一頁是第 33 頁，第 34 頁是空白的；但後者卻聲稱「第一章從第 7 至 35 頁」(Primum Caput à pag. 7. ad 35)。英圖館藏本此章只有兩篇，第一篇語法的第一段名詞從第 9 至 15 頁，第二段代名詞從第 15 至 21 頁，第三段動詞從第 21 至 26 頁，第四段其他詞類從第 26 至 30 頁；第二篇句法從第 30 頁中段至本章尾頁即第 33 頁。傅爾蒙只提及四個分段如下：「名詞從第 9 至 15 頁。代名詞從第 15 至 21 頁。動詞從第 23 至 26 頁。其他詞類從第 26 至 35 頁。」(Nomina à pag. 9. ad 15. Pronomina à pag. 15. ad 21. Verba à pag. 23. ad 26. Reliquæ Orationis partes à pag. 26. ad 35.) 後者的代名詞和動詞之間跳了兩頁或者可以歸咎於抄寫或排版時的疏忽，但傅爾蒙完全沒有提及關於句法的第二篇，確是令人費解。而且兩份原稿第一章的尾頁，一個是第 33 頁，一個是第 35 頁，亦差了兩頁。

第一部第二章題為「論中國語言的獨特風格」(De proprio Linguæ Sinicæ genio)。⁵³ 「英圖原稿」的第二章從第 35 頁開始，與第一章隔了一張空頁，至第 280 頁結束；但傅爾蒙描述他的稿本第一章在第 35 頁結束，而「第二章從第 35 至 281 頁」(Secundum Caput à pag. 35. ad 281)。在他的文本裡，第二章從第 35 頁中間開始，在第 281 頁結束，亦即與英圖館藏本的首尾兩頁均稍微不同。英圖館藏本這一章共有三篇，第一篇單字使用從第 35 至 106 頁；第二篇虛詞從第 106 至 218 頁，其中第八段關於虛詞「又」字由第 155 至 161 頁，第二十五段關於虛詞「耐」字和「奈」字在第 217 至 218 頁；第三篇譬喻從第 219 至 280 頁，包括從第 258 至 280 頁的成語匯集。在第二章裡傅爾蒙提供的頁碼相當詳細，除第一篇只有整篇頁數外，其餘兩篇均注明段落頁碼。本文只節錄其中有差異的，部分如下：「第二章……第一篇關於一些單字的用法從第 35 至 186 頁……第二篇關於日常語言裡虛

⁵² Étienne Fourmont, *Linguæ Sinarum mandarinicæ*, "Præfatio," pp. xvii-xx.

⁵³ 拉丁文 "genio/genius" 一字原是「天才」、「才華」或「傾向」之意，在中文裡只好大約意譯如上。

詞的用法從第 107 至 219 頁……第八段關於虛詞「又」字從第 155 至 162 頁……第二十五段關於虛詞『耐』字和『奈』字第 219 頁……第三篇關於譬喻……從第 219 頁至……280 頁」(Secundum Caput...Art. I. à pag. 35. ad 186. De usu aliquot Litterarum...Art. 2 à pag. 107. ad 219. De Particulis in sermone adhiberi solitis...⁸⁰ De partic. yeù illicò, absolutè, pag. 155-162...²⁵⁰ De partic. Naí, diustiùs, & nai, certè, p. 219...Artic. 3. De Figuris...p. 219...-280)。傅爾蒙聲稱第一篇尾頁為第 186 頁，顯然是第 106 頁之誤，因為他說第二篇從第 107 頁開始，這應該只是抄寫或排印時的小錯誤。「英圖原稿」大多數的段落頁碼與傅爾蒙藏本的一樣，但少數的偏差反而顯得突出：在英圖館藏本裡，第一篇在第 106 頁中段寫完，而第二篇則接著在同一頁（不是傅氏所說的第 107 頁）開始；前者第二篇第八段在第 161 頁完結（不是傅氏所說的第 162 頁），第 162 頁從一開始就是第九段；最後，前者第二篇第二十五段在第 217 至 218 頁（不是傅氏所說的第 219 頁），第 219 頁從一開始就是第三篇的文本（不是傅氏所說的第 219 頁中間）。

第一部第三章關於中國禮節，在英圖館藏本的標題是 *De Sinicâ urbanitate inter loquendum*，但傅爾蒙聲稱它的標題為 *De Sinicâ inter loquendum urbanitate*，字序不同，但並不影響文義，因為在拉丁文裡很多時候字序是相當靈活的。⁵⁴ 第三章共有一篇八段，從第 281 至 322 頁；兩份藏本八段的頁碼完全相同。但兩個稿本裡第一段、第二段和第八段的標題卻相當不同，不可能是抄寫或排印偶然出錯的結果。舉例：「英圖原稿」第 316 頁第八段的標題是 *Varii urbanè loquendi modi*，傅爾蒙所記錄同一段的標題則是 *Collectio variarum urbanitatum*，後者加上「彙編／彙集」一詞，明顯是一個新的標題。

「英圖原稿」的文本經常把羅馬字注音的標記寫於中文字旁邊，但在不同原稿裡的注音卻不完全一致。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當時仍無一套通用的注音方案。傅爾蒙的稿本描述沒有中文字，但有標明注音，為兩份稿本提供了可靠的比較基礎。兩份稿本裡絕大多數注音是一樣的，但也有一些例外。下列是一些不同之處，它們按英圖館藏本的頁數排列，首先展示該稿本裡的中文字和注音，再於括號裡展示傅爾蒙藏本的不同注音：第二章第一篇第十段第 86 頁「口」字 “keòu” (“keù”)；第十一段第 91 頁「手」字 “cheòu” (“xeù”)；第二篇第八段第 155 頁「又」字 “yeóu” (“yeù”)；第十一段第 172 頁「着」字 “tchö” (“chö”)；第十七段

⁵⁴ 《中國官話》的〈序言〉中，第 17 頁有本文所引用第三章的全名，但第 20 頁只有簡化的名稱 *De Sinicâ urbanitate*。

第 200 頁「過」字 “koũo” (“kũo”)；第二十三段第 214 頁「般」字 “poũān” (“puõn”, “puan”)；第二十四段第 216 頁「再」字 “tsái” (“çai”)；以及第三章第一篇第三段第 291 頁「請」字 “tsing” (“tsim”, “çim”) 和「敢」字 “kan” (“kàn”) 等。⁵⁵

上述幾個段落裡提出的這些例子只是兩份藏本大多數的不同之處，並非一個完整的清單。雖然如此，在閱讀時可能已相當複雜混亂，一個匯總列表會有助讀者理解（表二）。

表二：「英圖原稿」和傅爾蒙藏本第一部的分歧

	「英圖原稿」	傅爾蒙藏本
第一章		
頁數	7-33 頁 (34 空頁)	7-35 頁
篇段	一篇四段 26-30 頁，二篇 30-33 頁	一篇四段 26-35 頁，無二篇
第二章		
頁數	35 首-280 頁	35 中-281 頁
一篇	35-106 頁	35-186 頁 (後者應為 106 頁)
二篇	106 中-218 頁	107 首-219 頁
八段	155-161 頁	155-162 頁
二十五段	217-218 頁	219 頁
三篇	219 首-280 頁	219 中-280 頁
注音	口 keõu / 手 cheòu / 又 yeóu / 着 tchõ / 過 koũo / 般 poũān / 再 tsái	口 keú / 手 xeù / 又 yeù / 着 chõ / 過 kũo / 般 puõn, puan / 再 çai
第三章		
本章標題	De Sinicâ urbanitate inter loquendum	De Sinicâ inter loquendum urbanitate
八段標題	Varii urbanè loquendi modi	Collectio variarum urbanitatum
注音	請 tsing / 敢 kan	請 tsim (çim) / 敢 kàn

這裡必須強調，不同稿本之間有不同之處，並非「英圖原稿」和傅爾蒙藏本兩者之間獨有的現象——「英圖原稿」和「法圖原稿」之間同樣存在一些頁碼、文本、修改、標題及注音等分歧。這種情況在撰寫及抄寫原稿的不同抄本時是相當常見的，因為作者或抄寫者在謄寫時總會有錯漏，在文本分配上偶然也會出現一兩頁的差異，而在不同時間，作者亦可能對文字作一些修改。本文沒有探討後者這些不同之處只有一個簡單的理由：大家都明確知道英圖館藏本和法圖館藏本是兩份不同

⁵⁵ 傅爾蒙藏本注音見 Étienne Fourmont, *Linguae Sinarum mandarinicae*, “Præfatio,” pp. xvii, xix-xx.

的原稿，這是無人質疑的事實，但考狄和其他研究者卻認為英圖館藏本和傅爾蒙藏本是同一份原稿。

可是「英圖原稿」和傅爾蒙藏本的頁碼、標題和注音均有相當多的差異，而其中只有極少數可以歸咎於抄寫或排版時出現的錯誤。如果兩者果然是同一份原稿，上述絕大部分的分歧是不可能出現的。所以，雖然如李真所言英圖館藏本「與傅爾蒙對自己手中持有的馬若瑟手稿描述十分接近」，這並不足以證明「英圖原稿」和傅爾蒙藏本是同一份稿本。畢竟，兩者是同一份原稿的兩個抄本，它們的內容當然會是「十分接近」。不過，「十分接近」仍然只是差不多，差不多並非相同，我們不能夠視兩者為一。總而言之，考狄以第三章的存在推論「英圖原稿」為傅爾蒙藏本，李真以兩份稿本「十分接近」作為上述推論的佐證，均欠缺說服力。基於段落編頁、章節標題和漢字注音等各種文本證據，大英圖書館編號 O/C ADD. 11707 的手稿並非傅爾蒙當年收到的稿本，而是第三本馬若瑟的原始手稿。當然，英圖館藏本既然被證實不是傅爾蒙藏本，那我們也就必須接受後者不知所蹤，甚至可能已然流失的推論。

在確定總共起碼有三份《漢語筭記》原始手稿後，我們亦需要面對它們之間的先後問題。本文第一節已經確定了傅爾蒙藏本是作者希望刊行的稿本，亦即三份原稿的最後定稿。這一點毋庸置疑，也不需要分析稿本內容才能肯定。上文兩份現存原稿的頁碼分析，顯示在兩個稿本裡被劃掉的系列 A 的所有頁碼（包括回跳的十頁）均完全一致；但後加的系列 B 卻有些不同。系列 B 在「法圖原稿」裡跳過兩頁，且沒有出現在後面的一百多頁，但在「英圖原稿」卻沒有跳頁，而且從頭到尾都出現。根據兩者的頁碼分布，一個合理的推測是「法圖原稿」是比「英圖原稿」早的一份原稿。

在和傅爾蒙藏本第一部的頁碼和內容比較後，我們可以更加肯定這個推測是正確的。首先，根據傅爾蒙的描述，此最終原稿的頁碼跟「英圖原稿」系列 B 的頁碼十分接近。此系列的頁碼在兩者這一部的三章裡每一個頁面都有出現，而且基本上每章的編碼都一致，只是在中間的段落偶然會出現一頁或半頁的差異。即使是由同一個抄手執筆抄寫兩份稿本，這種小差異也是相當正常的。同樣重要的是，「英圖原稿」和傅爾蒙藏本都包含第一部的第三章，而「法圖原稿」卻沒有這一章，再次確認後者是一份較早的原稿。換句話說，在三份已知的原始稿本裡，現有的歷史資料和文本證據顯然足夠確定下述的時序——「法圖原稿」應該是最早的初稿，然後是「英圖原稿」，最後才是馬若瑟想出版的傅爾蒙藏本。

四、「英圖原稿」早期的收藏者是何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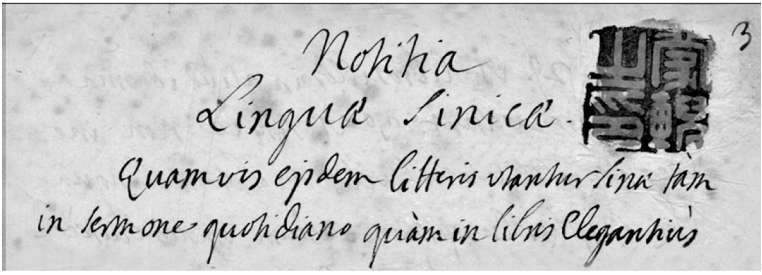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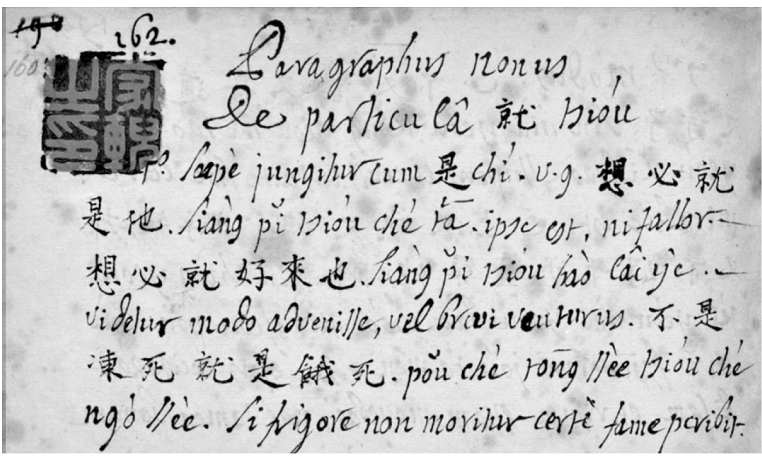
根據大英圖書館的記錄，該館現藏的《漢語筭記》稿本在入館前屬柯恆儒所有。但馬若瑟於 1736 年逝世，柯恆儒則於 1783 年出生，且於 1816 年才被委任為教授，顯然不會是「英圖原稿」的首位收藏者。雖然根據現在已知的歷史文獻，我們無法完全梳理清楚此稿本從一開始至今的流傳歷史，但起碼可以把這段歷史再往前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英圖原稿」好幾個頁面上都蓋有一個篆字圖章，對追蹤稿本流傳有很大的價值。李真注意到此印鑒，並指出在稿本第 3 頁的「右上角有一個模糊不清的書章，為中國篆體的書章，但已難以辨認」，⁵⁶ 所以她在書裡亦沒有再談及這個問題。她手上的稿本影像可能不很清晰，致使她錯過了一個追蹤藏書者的機會。筆者檢視此原稿時發現這個印章重複出現於系列 B 的第 3、162、163 和 322 頁，共四個頁面，除了蓋在第 163 頁上的因紙張破損而有點殘缺之外，其餘三個均相當完整。更重要的是，它們絕非「模糊不清」、「難以辨認」，相反地，在全彩色的掃描影像裡，這些印鑒十分清楚，明確地顯示出上面的四個朱色篆體文字為「蒙輓之印」。圖三「英圖原稿」兩個頁面之截圖，分別為蓋在第 3 頁右上角和第 162 頁左上角的兩個印章。

古代中國的讀書人和藏書家常會在藏書適當的頁面蓋上個人印鑒，這一向也是研究古籍出處及流傳的一個重要線索。一位叫「蒙輓」的人在「英圖原稿」的首頁、中間兩頁及尾頁都蓋上「蒙輓之印」的戳記，共四次，是他曾在柯恆儒之前擁有此稿本的有力證據。柯恆儒的藏書目錄標明此稿本是「四開本兩小冊」(2 cahiers pet. in-4)，這是它當年的狀況。⁵⁷ 但該稿本現在卻是一冊半牛皮包裝 (half-calf binding) 的四開本，顯示大英圖書館曾把入藏後的稿本重新釘裝。假定蒙輓在獲得此稿本後，按慣例在每冊之首、尾兩頁蓋上印鑒，一個合理的推測是稿本的第 162 頁其實是其中一冊的尾頁，而第 163 和 322 頁則分別是接下來的一冊之首頁和尾頁。不過，在沒有更多資料的情況下，我們無法確認到底蒙輓手上的《漢語筭記》是一個完整的稿本，或是只含第一部共兩冊的殘本。

⁵⁶ 李真，《馬若瑟《漢語筭記》研究》，頁 76。

⁵⁷ J. H. (Julius Heinrich) Klaproth, *Catalogue des livres*, p. 49.

收藏者印鑒一	
收藏者印鑒二	

圖三：大英圖書館藏本的收藏者印鑒

(來源：大英圖書館「英圖原稿」，Joseph Prémare,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 British Library Board, O/C ADD. 11707.)

蒙輓這個名字不太常見，他到底是一位姓「蒙」的中國人，還是一位外國人的譯名呢？下文幾份中外原始文獻可以確認蒙輓 (François de Montigny, 1669-1742) 原來是一位清初來華的法國傳教士，曾在康熙南巡時獲得賜見，但後來在禁教（其實嚴格上來說只是規管天主教）期間被驅逐出國。

在談論上述這段歷史之前，我們會按時序先介紹蒙輓入華前的經歷。蒙輓在 1669 年出生於巴黎，1687 年加入了當地的聖蘇爾比斯修會 (Compagnie des Prêtres de Saint-Sulpice) 之神學院。當時該修會與耶穌會在加拿大均相當活躍，相互競爭，偶爾會有一些衝突。蒙輓在 1692 年獲魁北克主教的邀請，加入了加拿大的教會。同年 8 月抵達魁北克，開始在不同崗位服務，曾代理主教的職務。⁵⁸ 魁北克

⁵⁸ Noël Baillargeon, "Montigny, François de," in G. W. Brown et al. (eds.), *Dictionary of Canadian Biography*, vol. 3, 1741-1770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4), pp. 469-470. 這篇傳記引用了不少原始資料和二手文獻，包括傳記作者關於魁北克神學院及加拿大傳道史的著作，是蒙輓入

神學院的理事們於 1698 年建議向密西西比河兩岸的印第安人傳教；主教批准後，決定派蒙輓帶領兩位同工前往。他們面對種種困難，但也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績，據報當地的夸帕族印第安人 (Quapaw) 亦同意「為傳道者們搭蓋一棟房子」。⁵⁹ 蒙輓於 1700 年重返魁北克，並於 1701 年初獲巴黎外方傳道會 (Société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派往中國，開始他在華六年的傳道生涯。⁶⁰ 外方傳道會一向注重亞洲，自十七世紀中葉以來，梵蒂岡當局就透過該會直接委任主教向「中國和鄰國傳教」，負責在「異教徒之地」(in partibus infidelium) 宣揚福音。⁶¹

蒙輓的身分可以透過兩份中文和兩份外文史料來確認。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有一本封面題為《綸音特典》的小冊子，沒有詳細的刊行資料，頁面版心卻鐫有「熙朝定案」四字，應該是與《熙朝定案》及《熙朝特典》等同類的天主教人士的自刻刊物。這本薄薄的小冊子只有三葉，亦即六頁，生動地描述了康熙在 1705 年初南巡時與蒙輓的接觸，全文如下：

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初九日午刻，皇上南巡，舟抵淮安皇華亭，住泊浙江嚴州府天主堂，西洋進士蒙輓同江寧天主堂西洋進士楊若翰，恭接聖駕，奉旨著養心殿總領張常住引至御艦，陛見即顧問云：你們兩個是何國人？有多少年紀？到中國有幾年？曾到過京否？今住何堂？俱各一一回奏。又問蒙云：你在浙江嚴州來麼？奏云：聞萬歲南巡，臣即不勝踴躍，從嚴州特來接駕。皇上大悅。隨持方物一十二種，進呈御覽。諭云：你且將方物帶回本省，朕到替你全收。

四月初三日，蒙輓在杭州恭迎聖駕，隨至織造府行宮，進呈西洋方物。養心殿總領張傳旨將方物收進。御覽全收，天顏甚喜，即賜銀九十兩。又進呈皇太子方物十二種，亦著內監收進。

華前後事跡的可靠參考資料，但它對蒙輓在華的歷史則只有寥寥數語。

⁵⁹ Linda C. Jones, "Nicolas Foucault and the Quapaws," *The Arkansas Historical Quarterly*, 75.1 (2016), p. 6. 原文："The Quapaws agreed that they would...build a house for the missionaries." 蒙輓 1699 年 1 月 2 日的法文信函原見於 (François) de Montigny et al., *Relation de la mission du Missisipi du Seminaire de Québec en 1700* (Nouvelle York: Cramoisy de Jean-Marie Shea, 1861), p. 47. 原文："...se qu'ils doivent faire ce printemps prochain et meme ils veulent aussy nous faire une maison pour nous engager a les aller voir et a demeurer chez eux...."

⁶⁰ Noël Baillargeon, "Montigny, François de," pp. 469-470.

⁶¹ Adrien Launay,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étrangères*, vol. 1 (Paris: Téqui, 1894), pp. 34, 45.

初九日，皇上駐蹕西湖行宮。未刻，特命內大臣諭總領張傳旨，次日命西洋進士嚴州天主堂蒙輓送駕陞見。

初十日，聖駕回鑾，蒙輓同衢州天主堂西洋進士艾毓翰、杭州天主堂西洋進士艾斯玳、蕭山天主堂西洋進士何納多、湖州天主堂西洋進士隆盛等僱一小舟，至謝村塘口跪送。皇上一見，即親開龍舟窻子，以手招輓等小舟近御艦，問各臣是何國人？五臣等俱各回奏。又問云：你們在地方俱好麼？回奏云：臣等荷蒙皇上洪恩，俱好。又命御前內監將御膳烹炙熟豬一口，欽賜五臣為點心云云。臣等即叩頭謝恩，即隨龍舟至儀金渡，蒙皇上又問：你們往那裡去？五臣等奏云：恭送聖駕，叩謝皇恩，意欲遠送。皇上親自諭曰：你們自當回去，不必遠送了。臣等遵旨謝恩而回。伏念輓等西陬鄙儒，恭遇皇上慰顧頒賚，誠不世之殊恩，柔遠之至意也。謹將顛末敬刊方冊，少誌勿忘，復思無可仰報，惟日於天主臺前恭祝天子萬年永享真福於無疆云爾。⁶²

康熙在二十三年（1684）至四十六年共六次南巡，多次接見各地的傳教士，和他們對話，對他們頗友善。在明、清二代，嚴州府是浙江省的一個府，毗鄰杭州府。蒙輓在知道康熙於四十四年第五次南巡的消息後，「持方物一十二種」前往接駕，幸運地得到康熙接見，獲得「御覽全收」，更令皇上「天顏甚喜，即賜銀九十兩」。蒙輓等之所以「敬刊方冊」，其目的無非是向信眾和官員宣傳皇帝之恩寵，所以這段敘述或多或少會有些渲染。但無論如何，這份文獻起碼確認了蒙輓的身分，亦間接證實了當時康熙對入華的天主教傳教士們基本上是相當禮遇和愛護的。

可惜好景不常，錯綜複雜及歷時多年的所謂禮儀之爭（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在教宗禮訪使多羅（Charles 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 1668-1710）於 1705 年來華後開始白熱化，終於一發不可收拾。在 1694 年來華的德國耶穌會士紀理安（Kilian Stumpf, 1665-1720）頗獲康熙皇帝信任，首先被命令負責清廷位於北京天主教北堂的琉璃工場，繼而於 1711 年成為正五品的欽天監監正。多羅入華後他編輯了一份長達一千四百多頁的《北京紀事》（*Acta Pekinensia*），詳細記錄了多羅與清廷交涉禮儀之爭的經過，是一份重要的一手資料。這份珍貴的原始文獻多年來被埋沒在耶穌會的檔案館裡，近年才被譯成英文版刊行，可以更廣泛地供研究者參考。根據紀理安的記錄，「孟尼」（英譯本譯名，François Montigny）於多羅

⁶² 《繪音特典》（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年間刊本），葉 1-3。原文無標點符號。

抵華後加入使團，有說是成為「秘書」，跟隨他出差並與清朝當局交涉。後來交涉失敗，康熙在第六次南巡時破例地沒有再接見各地的傳教士，並下旨規定他們必須通過當局審查領票後，方能繼續留在中國傳道。《北京紀事》亦聲稱多羅曾嘗試取得清廷發出之票據，容許「保留三家屬於聖會之會所」，包括孟尼在杭州的那一家。⁶³

另一份比較同情教宗禮訪使的早期記錄是 1714 年出版的《中國新一輪宗教迫害記》(*Relation de la nouvelle persecution de la Chine*)。這本書亦有相關的記載，說康熙第六次南巡時，有十一位神父聚集在浙江首府杭州由蒙輓負責的傳信部 (*Congregation de la Propagande*) 教堂裡等候消息，耶穌會在杭州的教堂也有一些該會的神父聚集。當康熙下旨審查各差會成員時，由皇帝身邊的傳教士譯成拉丁文的聖旨就被「送往在杭州教堂的蒙輓」，並由他轉達給堂內眾人。此書的作者是一位道明會 (*L'ordre des Prêcheurs/Dominican Order*) 會士，該會在禮儀之爭上一直與耶穌會對立。所以，根據他的看法，禁教的理由很簡單：「中國皇帝根據耶穌會士的訊息頒布了不利於宗主教〔多羅〕之詔書」。⁶⁴

來自江蘇常熟的天主教徒何世貞（生卒年不詳）在康熙年間先後撰寫了《崇正必辯》和《崇正必辯》後集，是可以確認蒙輓身分的第四份原始資料。《崇正必辯》後集下卷裡告訴我們規管天主教的聖旨下達後，一些歐洲傳教士的下場如下：

康熙四十六年三月初一日奉旨，西洋人波耳都、噶國人穆德我、安懷仁、李若瑟、瞿良士、索諾，此五人俱著廣東天主堂居住修道，俟龍安國、博賢士來時一並同來，給票不給票之處那時定奪，伊等道不傳。本月初八日奉旨，西洋拂郎濟亞國人蒙輓、董默覺；意西巴尼亞國人巴祿茂、萬多默、方濟國、賴鳴遠、羅森鐸、山若蘭、艾毓翰、山若谷此十人驅逐前往澳門去，意西巴尼亞國人郭多祿在廣東天主堂居住。四月初八日奉旨，西洋拂郎濟亞國人赫宣、依大里亞國人施體仁交與江寧總督巡

⁶³ Kilian Stumpf, Paul Rule & Claudia von Collani (eds.), *The Acta Pekinensia or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Maillard de Tournon Legation*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2019), pp. 301, 304, 321, 471.

⁶⁴ François Gonzales de S. Pierre (Francisco González de San Pedro), *Relation de la nouvelle persecution de la Chine Jusqu'à La Mort du Cardinal de Tournon* (Paris (?): publisher unknown, 1714), pp. 96-97, 102. 原文：「M. Pierre Hervé traduisit cet Edit de l'Empereur de chinois en latin, & l'envoya à M. François de Montigny, qui le reçût dans l'Eglise de Hangeceu」；「L'Empereur de la Chine sur les informations des Jesuites, publie un Edit contre M. le Patriarche。」注意兩份外文資料均沒有區分杭州府與毗鄰的嚴州府。

撫，五日內起程往澳門去，同哆羅同回去。伊等若過限期，督撫即上鎖往廣東澳門。⁶⁵

換句話說，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上半年的兩個月裡，一眾天主教傳教士首先被逼在教堂裡「居住修道」，繼而被「驅逐前往澳門」，無法再在中國境內宣教。其時當局對沒領票的傳教士們一點也不客氣，明言「伊等若過限期，督撫即上鎖往廣東澳門」。多羅最後亦無法保護他想留下的傳道基地，因為被趕走的人包括了「西洋拂郎濟亞國〔法國〕人蒙輓」。

近年華人學者對明清二代入華傳教士的研究也可以充實大家對蒙輓和此段歷史的理解。肖清和確認蒙輓等曾於康熙四十四年在杭州獻上「方物若干」，並列出康熙收取之六種西洋方物，即「日月星鐘、天文比例尺、西洋文具、西洋秤、日晷、女魚骨珠」。⁶⁶ 韓琦探討康熙南巡的歷史，根據《綸音特典》和《熙朝定案》等肯定康熙在第五次南巡時曾先後三次見過蒙輓、艾斯玳和隆盛等人。但一年多後，當康熙得知多羅來華的真正目的是禁止祭孔和祭祖後，他「感到皇權受到了外來干涉」，於是在 1706 年 12 月下旨要求傳教士需接受「利瑪竇規矩」而容許傳統祭禮方能領票繼續居留。另一方面，多羅卻採取了強硬的回應，在 1707 年 1 月發布了「南京敕令」(Regula)，嚴禁教徒參與各種祭禮。這次公開決裂後，康熙在第六次南巡時態度大變，沒有再與傳道者們見面。隨後，很多耶穌會士都表示願意遵守領票條件，並揚言「永不回西洋」；但不願意接受「利瑪竇規矩」的其他傳教士終於被驅逐出境。⁶⁷ 不久之後，多羅接到聖諭，被勒令暫時不能回歐，需被囚禁在澳門。康熙曾嘗試圓滿解決事件，派遣在華的耶穌會士回羅馬教廷溝通說項。他亦相當關心此事之進展，曾「詢問西洋人有何消息」，後來又說「爾若得西洋消息著即報來」等。但在教皇的回信寄達之前，多羅已於 1710 年 6 月在澳門去世。⁶⁸

⁶⁵ 何世貞，《崇正必辯》（清康熙年間刊本，<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722306>），後集，下卷，第 659 條，2021 年 8 月 1 日下載。

⁶⁶ 肖清和，〈禮物與明末清初天主教的適應策略〉，《東嶽論壇》，34.3（濟南：2013），頁 86。注意禮物數量等細節與《綸音特典》的描述有些不同，而此列表的章節附註 44 則只標明「主要資料來源：《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正教奉褒》」。

⁶⁷ 韓琦，〈南巡、傳教士和外交——兼論康熙對禮儀之爭和教廷特使多羅來華的反應〉，《文化雜誌 RC》，102（澳門：2018），頁 61-63。此文引用不少天主教刊物的原文，包括本文亦有引用的《綸音特典》。

⁶⁸ 韓琦，〈姍姍來遲的“西洋消息”：1709 年教皇致康熙信到達宮廷始末〉，《文化雜誌 RC》，55（澳門：2005），頁 3。

被驅逐後，蒙輓「大約在 1709 年底或翌年初」重回歐洲，⁶⁹ 並在 1711 年 7 月 10 日被委任為巴黎外方傳道會神學院的理事之一。翌年，他成為魁北克神學院駐巴黎代表 (Procurator) 傅彌貝 (Henri-Jean Tremblay, 1741-1770) 的助手。傅氏也是巴黎神學院的理事，亦曾在魁北克的教會裡服務，同時負責外方傳道會和魁北克神學院很多行政與財務工作。蒙輓於 1714 年被調往羅馬，擔任外方傳道會駐羅馬的代表。1728 年，當傅彌貝雙目幾乎完全失明而再也無法工作後，蒙輓才被調回接任前者的職位，繼續支援魁北克神學院及早期加拿大殖民地的各種需求。1742 年 12 月 19 日，蒙輓在巴黎的神學院裡逝世。根據外方傳道會的記錄，他臨終時曾說他離開塵世時「既無債務亦無財產」(without debts and without possessions)，無愧於他作為神職人員的身分。⁷⁰

蒙輓對漢語興趣濃厚，曾與傅爾蒙往來，兩人更互相推崇，惺惺相惜。蒙輓看過傅爾蒙的《漢語論稿》，並在 1733 年的信裡聲稱「在詳細閱讀過他關於該語言的所有作品後，我與別人一樣欣賞他在這方面取得的重大進展」。⁷¹ 傅爾蒙亦曾在《中國官話》的序言裡提醒讀者不要忘記馬若瑟之外的入華傳教士們，更問：「為何遺忘傑出者蒙輓呢？」(cur clarissimi viri Montignii oblivisceremur?)⁷²

雷慕沙告訴我們「蒙輓……撰寫過一些漢語語法，傅爾蒙曾說過它們在他手裡，但後來就不知所蹤」。不過雷慕沙估計蒙輓的語法著作大概和傅爾蒙的差不多，不見得會有大的突破，所以它們的遺失「並非無法彌補之損失」(la perte n'en est pas irréparable)。⁷³ 這個推測應該是合理的——畢竟，蒙輓在華時間不長，根據上段的描述，兩人對漢語學習的看法大概也是比較接近的。

順帶一提，本節曾引用的《綸音特典》，其在巴黎和羅馬的刊本內容均與外方傳道會及蒙輓有關。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的那一本書皮上方有以墨水寫的“Sem^{re}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字樣，顯示此小冊子來自巴黎的外方傳道會神學院，很可能是由蒙輓提供的。韓琦則聲稱「在羅馬也發現《綸音特典》刻本，有“蒙輓”中文圖章」，相信是蒙輓從中國帶回來，然後捐贈給圖書館的個人藏書，此亦再次確

⁶⁹ Noël Baillargeon, “Montigny, François de,” p. 470.

⁷⁰ Ibid.

⁷¹ Lettre de Monsieur de Montigny, Directeur du Seminaire des Missions Etrangères, à M. le Duc d'Antin, 28 Fevrier, 1733, in Étienne Fourmont, *Meditationes Sinicae*, p. 139.

⁷² Étienne Fourmont, *Linguae Sinarum mandarinicae*, “Præfatio,” p. ij.

⁷³ Jean-Pierre Abel-Rémusat, *Élément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1822), p. ix. 原文：“P. Montigny...avoient composé des grammaires chinoises; mais on ignore ce qu'elles sont devenues depuis Fourmont, qui dit les avoir eues entre les mains.”

認蒙輓有在藏書裡印上自己印鑒的習慣。⁷⁴

蒙輓、馬若瑟和傅爾蒙基本上是同一個時代的人，而且在不同的時空裡認識對方。蒙氏既然是「英圖原稿」的早期藏者，他亦有可能是稿本到達歐洲後的首位收藏者。本節透過原始材料和二手資料肯定蒙輓作為藏者的身分，並整理了他的一些生平事跡和在華經歷，但這些文獻無法確認他獲得此原稿的時間及詳情。到目前為止，我們不能完全勾勒出「英圖原稿」由蒙輓收藏的歷史。再者，蒙輓於 1742 年逝世，而柯恆儒出生於 1783 年，可以推論兩者之間起碼還有一位不知名的收藏者或機構，可能是蒙輓的親屬或傳道會當局。柯恆儒曾經擁有馬若瑟在 1733 年 10 月 5 日寫給傅爾蒙的信，後來更將它公諸於世。假定這手稿是馬氏自己的抄本，最初會不會夾在蒙輓曾經藏有的《漢語筭記》原稿裡呢？如果此猜測屬實，那柯恆儒是否又從同一個來源得到信函和原稿呢？這些都是我們暫時無法解答的問題，因為已知的資料無法確認這個來源，我們不知道蒙輓和柯氏之間的收藏者是誰。最有可能提供線索的文獻應該是柯恆儒的藏書目錄，但關於這份手稿的介紹並不包括柯氏得到稿本的經過或它原來的收藏者。「英圖原稿」的流傳歷史雖然因為加入蒙輓的收藏經歷而延長了，但仍然留下一些空間給未來的研究者。上文曾提及現有文獻同樣不能肯定「法圖原稿」如何以及何時入藏巴黎皇家圖書館，所以現存兩份原稿之流傳歷史暫時都留有空白。

五、「英圖原稿」對研究稿本內容有何作用？

「法圖原稿」是一份完整的稿本，含緒論、第一部和第二部的文本，而這份原稿的一份抄本後來成為《漢語筭記》出版首刊本的母本。但是，這並不表示此書的稿本內容已經沒有研究的價值。本節將簡單地回顧「法圖原稿」終於刊行的經過，然後討論「英圖原稿」對研究《漢語筭記》的文本內容在兩方面的重要性。

雷慕沙發現「法圖原稿」後，很快地就獲准複製了一份抄本。在細讀了內容後，他變成馬若瑟的忠實擁護者，認為傅爾蒙的批評「嚴厲不公」(*sévère jusqu'à l'injustice*)，且對馬氏著書的意圖缺乏了解。雷氏在 1822 年刊行的《漢文啟蒙》(*Élément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裡正確地指出「馬若瑟神父是唯一一位能將兩種

⁷⁴ 韓琦，〈南巡、傳教士和外交——兼論康熙對禮儀之爭和教廷特使多羅來華的反應〉，頁 65，尾注 13。

中國語文風格明確區分的人，所有其他語法學家對此都感到困惑」。不過，如上文所述，該書有「不少於一萬二千個例句和五萬個中文單字」，他認為「這將會永遠是出版此珍貴著作之障礙」。⁷⁵

但是，由於歷史的機緣巧合，此障礙卻在不久之後被克服。愛爾蘭人金斯伯勒子爵 (Lord Kingsborough, 1795-1837) 在得知此事之後，於 1824 年 9 月主動聯絡當時在英國休假的倫敦會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傳教士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促成此書的出版。⁷⁶ 金氏提議捐贈一筆可觀的款項給馬氏於 1818 年在馬六甲創辦的英華書院，唯一的條件是該書院必須「利用〔款項的〕第一筆利息印刷一本由耶穌會士撰寫的中文語法書」。⁷⁷ 兩人同意後金斯伯勒就致函雷慕沙，告知「與〔馬禮遜〕博士安排該書的出版」，⁷⁸ 並要求雷氏提供稿本。1825 年 3 月，金斯伯勒再度寫信給馬禮遜，表示「雷慕沙已經在他的學生裡找到了一位合資格者」抄寫手稿。⁷⁹ 這位學生是儒蓮 (Stanislas Aignan Julien, 1797-1873)，他根據雷氏的抄本在同年 8 月完成了打算用於印刷的抄本。⁸⁰ 馬禮遜在 1826 年 2 月透過金氏收到抄本，5 月乘船離開英國前往亞洲，大約於 8 月把抄本轉交給了書院。英華書院的校長修德 (Samuel Kidd, 1804-1843) 於 1831 年初的信函裡確認「拉丁文的中文語法書已於一月份完成」，是為《漢語彙記》的首刊本。⁸¹ 繼而，廣州在 1847 年發行了一本《漢語彙記》的英譯本；而香港則在 1893 年重刊了拉丁文原版。⁸²

歷史發展使「法圖原稿」成為《漢語彙記》最重要的稿本，因緣際會地取代了

⁷⁵ Jean-Pierre Abel-Rémusat, *Élément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pp. ix, x.

⁷⁶ 金斯伯勒的原名是 Edward King，父親是伯爵，本人是子爵，但英語習慣把有爵位的貴族統稱勳爵 (Lord)。

⁷⁷ Letter, Morrison to Clunie, 6 Sep. 1824, in Eliza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 2 (London: Longman, 1839), pp. 287-288.

⁷⁸ Letter, Kingsborough to Abel-Rémusat, 14 Sep. 1824, in Jean-Pierre Abel-Rémusat,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auctore P. Premare," p. 539.

⁷⁹ Letter, Kingsborough to Morrison, 8 Mar. 1825, in Eliza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 2, p. 318.

⁸⁰ Jean-Pierre Abel-Rémusat, *Nouveaux mélanges asiatiques*, vol. 2, p. 273.

⁸¹ Samuel Kidd, Letter, Samuel to LMS, 7 Mar. 1831, Singapore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Archive), CWM/LMS/Ultra Ganges, Malacca/Incoming correspondence/Box 3/Folder 2, p. 4.

⁸² 關於《漢語彙記》於十九世紀在亞洲得以刊行的詳細歷史可參考柯保羅，〈馬若瑟《漢語彙記》的抄本和刊本新探〉，《漢學研究》，39.1（臺北：2021），頁 161-206；Paul Kua, "Premare's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1728-1893: The Journey of a Language Textbook," *East Asian Publishing and Society*, 10.2 (2020), pp. 159-200.

馬若瑟寄給傅爾蒙的原始稿本，成為首刊本的母本，開創了後來幾波刊行本之流傳。然而，「法圖原稿」並非該書作者希望刊行的最終稿本；最終稿本亦即傅爾蒙藏本顯然已經流失，但是「英圖原稿」比「法圖原稿」更加接近傅爾蒙藏本，所以它對稿本內容的研究有關鍵作用。對於英圖館藏本的重要性，柯恆儒的藏書目錄是如此說的：

它包含重要的修訂和許多與馬六甲刊本的不同之處，後者根據不正確的稿本出版。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可以在此找到關於中國禮節的第三章，共四十二頁，這是刊行版裡所沒有的。⁸³

這段短短的描述恰好是下述兩點論述的一個匯總。

首先，「英圖原稿」可以幫助修訂原稿裡不少的字句。在對比兩份稿本第一部的第一和第二章後，我們可以在「法圖原稿」的文本裡加入「英圖原稿」裡相當數量的各種改動和增刪，使修正後的原稿更加接近最終定稿之原貌。李真在《馬若瑟《漢語筭記》研究》裡列出了兩份原稿十多條的所謂「異文」，把它們細分為「脫文、訛文、衍文、錯亂、增補、刪除、翻譯修訂、漫漶不清」八類。⁸⁴ 其實馬氏在「英圖原稿」裡作出了許多改動，「異文」的數量並不止於該書列出的例子。本文的主要目的並非稿本內容的詳細分析，在此不列出兩份原稿裡所有的差異，僅按頁數先後選出三段文字，作為這些異文點題式的說明。

1. 「法圖原稿」系列 B 的第 52 頁有「不是打便是罵」的中文例句，拉丁文被譯為“*si non verberat, certè maledicit. i.e. non cessat aut verberare aut maledicere*”。

「英圖原稿」系列 B 的第 50 頁（因為「法圖原稿」中間錯誤地跳過了第 38、39 頁）有部分刪除過的譯文“*si non verberat, certè maledicit. i.e. ~~non cessat aut verberare aut maledicere~~*”。李真沒有引用此例句，但如果有的話應該會把它歸類於部分解釋的「刪除」。原來的中文例句不難理解，而書裡很多更加難以明瞭的例句，經常也只有一句譯文。第一句拉丁文譯文「如果不是打，肯定

⁸³ J. H. (Julius Heinrich) Klaproth, *Catalogue des livres*, p. 49. 原文：“...il contient des corrections importantes et des variantes nombreuses qui le sont différer en plusieurs points de la publication de Malacca, exécutée d’après une copie incorrecte. On y trouve notamment un Caput tertium; de sinica urbanitate inter loquendum, de 42 p. qui n’exite pas dans l’imprimé...”。

⁸⁴ 李真，《馬若瑟《漢語筭記》研究》，頁 114-122。

就是罵」清晰易懂，第二句譯文「不停地或打或罵」既是畫蛇添足，也沒有第一句譯文那麼接近原文，作者把它劃掉後，的確使得文本更加簡潔、精確。

2. 「法圖原稿」系列 A 的第 208 頁（在這部分頁面裡「法圖原稿」沒有後加的系列 B 頁碼）有以中文、注音、拉丁文和法文（稿本裡偶然會加入法文解說，更會以“Gall.”字標明是法文而非拉丁文）寫出的例句：“背著母親 poèi tchõ mòi ts’in, celavit matrem. Gall. en derriere de sa mere”。「英圖原稿」系列 B 的第 174 頁（等於已被劃掉的系列 A 的第 208 頁）有已經修改過的例句“背著母親 poèi tchõ mòi ts’in, celavit matrem. Gall. ~~en derriere~~ à l’insceû de sa mere”。李真引用此例句，並把它歸類於「漫漶不清」。可能是因為「英圖原稿」的影印本不很清晰，她聲稱該例句「刪去 derriere，改為另一個法語詞，但字跡模糊不清」，於是她沒有辨認“l’insceû”。⁸⁵ 注意法文“en derriere”只是「背著」的字面解釋，但“à l’insceû”（l’insceû 是法文古字，等於現代法語的 l’insu）明顯是個更好的解釋，因為它是「背著」的形象化解釋，比喻在對方不知情或沒有參與的情況下。⁸⁶ 馬若瑟在思考後決定把前者劃掉並採用後者，這是一個合理的改進，使詞語的原意更加清晰。
3. 「法圖原稿」系列 A 的第 305 頁有例句“做一日和尚...uno die monachus es...”，講的是「和尚敲鐘」的成語。「英圖原稿」系列 B 的第 271 頁（等於已被劃掉的系列 A 的第 305 頁）有已經修改過的例句“做一日和尚...uno die ~~monachus~~ bonzius es...”。李真把此例句歸類於「翻譯修訂」，認為「將 monachus 改成 bonzius，專指佛教的和尚，翻譯更準確」。⁸⁷ 把修士“monachus”劃掉，改為和尚“bonzius”，在「和尚敲鐘」這個語境裡當然不能說是錯誤。但敲鐘亦是天主教修士和神父在修院或教堂裡的工作，「法圖原稿」的譯句對在歐洲的讀者們來說應該更加容易明白和認同。畢竟絕大多數十八世紀的歐洲人都不知道佛教寺院裡有鐘、和尚們會敲鐘。馬若瑟在翻譯其他成語時也會作類似的調整，例如「英圖原稿」系列 B 的第 268 頁把「閒時不燒香，急來抱佛腳」用義大利成語 (Itali dicunt) 意譯為“passato il

⁸⁵ 同前引，頁 122。

⁸⁶ 關於此古字的意思可參考 Pierre Richelet, *Nouveau dictionnaire françois*, vol. 1 (Cologne: Jean François Gaillard, 1694), p. 520. “A l’insceû” = “Sans qu’on le sache,” 意即「不為人所知」。整句 “à l’insceû de sa mere” 英文可譯為 “unbeknownst to his mother”。

⁸⁷ 李真，《馬若瑟《漢語筭記》研究》，頁 121。

pericolo, gabbato il santo”。這句話可被直譯為「危險過後，聖人被嘲」。⁸⁸ 以天主教的「聖人」代替中國人的「佛」，對歐洲人來說，確是比較容易理解的。但反過來說，這句歐洲成語的中譯卻有點彆扭，中國讀者可能會不太明白，當然又沒有「閒時不燒香，急來抱佛腳」那麼傳神。翻譯不同語言的成語時，譯者會考慮譯文的受眾，選擇一個後者的文化裡比較容易理解的譯法。既然可以用「聖人」代替「佛」，為何不能以「修士」代替「和尚」呢？從上文第一節我們知道《漢語彙記》的初稿曾經由耶穌會的郭中傳、孟正氣和聶若翰分別於 1728 年 4 月 12 日、8 月 2 日和 12 月 12 日審閱。「英圖原稿」的修改是比較忠於中文原文的直譯，但卻不利於目標讀者對此例句的理解，亦有可能是耶穌會同工們審閱後要求的修改。和上述借用現成成語的情況不同，把和尚譯成修士不太恰當，更可能有點「政治不正確」。他們可能會認為天主教裡可以有在順境時忘卻，甚至嘲笑聖人的信眾，卻不應該有得過且過、敲鐘過日子的修士。

我們必須重申上述只是「英圖原稿」裡，由馬若瑟作出眾多修改的幾個例句，把這些修改全都納入原稿可以使「法圖原稿」的第一部更加準確清楚，且接近原作者之最終定稿。

第二，「英圖原稿」可以顯著地充實已知的原稿文本。英圖館藏本雖然只是一份殘本，但它含括不見於「法圖原稿」和關於中國禮節的第一部第三章，引進此章的文本明顯地豐富了《漢語彙記》的內容。「英圖原稿」第一部第三章雖然只有一篇，但該篇卻共有八段文字之多。李真的書裡有論述此章的內容，但把第一段和第二段合併，題為「稱謂禮儀」；再把第三段和第四段合併，題為「表謙遜的禮儀」；然後列出其餘關於拜賀、送禮和宴請的禮儀，最後介紹禮貌用語，亦即分為六段介紹。⁸⁹ 這個做法在邏輯上不能說不合理，只是與原作者文本裡的編排不同。同樣地，本文無意論述第三章的詳細內容，下面只列出此章每段的簡化標題、頁碼並列舉三個例句：

⁸⁸ David Evans Macdonnel, *A Dictionary of Select and Popular Quotations*, 4th American ed. (Philadelphia: A. Finley, 1824), pp. 211-212. 原文：“Passato il pericolo, gabbato il santo. Ital. Prov.— ‘When the danger is past, the saint (whose aid was before invoked) is mocked.’”

⁸⁹ 李真，《馬若瑟《漢語彙記》研究》，頁 182-192。

1. 第一段講解第一人稱的稱謂 (*De ego et meus*)，從系列 B 的第 282 頁開始，有例句如「晚生」、「不才」和「老拙」等。
2. 第二段講解第二人稱的稱謂 (*De tu et tuus*)，從第 287 頁開始，有例句如「夫子」、「相公」和「貴處」等。
3. 第三段討論「請」和「敢」兩個字的應用 (*De tsing et kan*)，從第 291 頁開始，有例句如「請教」、「有請」和「敢問」等。
4. 第四段討論「教」和「命」兩個字的應用 (*De kiao et ming*)，從第 293 頁開始，有例句如「領教」、「賜教」和「聞命」等。
5. 第五段論述拜訪禮節 (*De visitationibus*)，從第 296 頁開始，有例句如「多多拜上」、「請留貴步」和「失迎恕罪」等。
6. 第六段論述送禮習俗 (*De munusculis*)，從第 305 頁開始，有例句如「薄禮伏乞笑納」、「厚禮何以克當」和「卻之不恭，受之有愧」等。
7. 第七段論述宴會聚集 (*De conviviiis*)，從第 310 頁開始，有例句如「掃門拱候」、「一杯水酒」和「珍饈滿桮」等。
8. 最後一段即第八段介紹一些典型的禮貌用語 (*Varii urbané loquendi modi*)，從第 316 頁至第 322 頁，有例句如「銘刻五中」、「粉首碎身莫能報答」和「但憑相公尊便」等。

馬若瑟並非第一位向歐洲人介紹中國禮節用語的人，道明會士萬濟國於 1682 年以西班牙語撰寫的《華語官話語法》(*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 也有類似的論述。⁹⁰ 開始時這本書只是以手稿流傳，他逝世後另一位傳教士才於 1703 年在廣州刻板刊行。此書尾部從第 84 至 99 頁共十六頁專門講解不同場合裡的禮貌用語和稱謂等，但例句只有西班牙文的解說和漢字的羅馬注音，沒有中文字。⁹¹ 「英圖原稿」第一部第三章裡的內容則比較詳細，共四十一頁，附帶了更多的實例，幾乎全有注音、解說以及中文原文，顯然優於《華語官話語法》。

⁹⁰ Francisco Varo, *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 compuesto por el M. R. P. fr. Francisco Varo de la sagrada Orden de N. P. S. Domingo* (Canton: publisher unknown, 1703). 傅爾蒙曾把此書的內容譯成拉丁文並在《中國官話》裡刊行，但沒有說是萬濟國的原著，這也是受到一些研究者詬病，並指控他抄襲的另一個原因。

⁹¹ 此書 2000 年刊行的英譯本在原著的注音後加上中文字。見 W. South Coblin & Joseph A. Levi (eds.), *Francisco Varo's Grammar of the Mandarin Language, 1703: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0).

這裡以兩個例子來說明兩本著作的分別：它們均有介紹第二人稱稱謂「貴」字的應用，包括前者的“*tuum corpus* 貴體 *kouei ti*”和後者的“*su cuerpo*, *kuéi tǔ*”。兩者前面的拉丁文或西班牙文均意指「你的身體」，可是後者沒有中文，而中文的同音字頗多，外國讀者有時會看得一頭霧水。「英圖原稿」系列 B 的 290 及 302 頁講解官員或貴客來訪時的客套話，有「多蒙垂顧」、「得蒙下顧」、「蒙大人光顧」、「賜顧」以至「怎麼必勞大人見顧」和有關的拉丁文解說及注音。《華語官話語法》中此段只有兩句，就是“*tō mùng kuāng kiàng*”和“*tō mùng cù kù*”；沒有附上中文，即使懂中文的人也要琢磨一會才知道是「多蒙光降」和「多蒙賜顧」。⁹²馬氏此章裡的實例相當多，同時標示中文和注音，可以更有效地幫助讀者學習相關例句。第三章裡的這些在中國傳統社交上需要注意的用詞，都是馬若瑟原來希望放進《漢語彙記》書中，但「法圖原稿」和後來的各種刊本都沒有的部分。

今天，兩種《漢語彙記》拉丁文刊本均為罕見的古籍，況且，文本的拉丁文解說亦是一個重要的言語障礙。它的英譯本也同樣難得一見，而且不少有識之士對其評價亦貶多於褒，甚至評論它有時會「以最令人驚訝之方式扭曲拉丁文原文的意思」。⁹³對許多現代外國讀者來說，《漢語彙記》仍是相當有閱讀價值的漢語語法書。近年來亦有不少華人學者探討該書的語言習得觀，或語法和詞彙之類的問題。⁹⁴有鑒於此，筆者不禁要問：與其重刊此書不太完整的拉丁文版本，或不太理想的英文譯本，為何不刊行一本比較接近馬若瑟最終定稿的全新英文，甚至是中文的譯本呢？若果有人打算刊行新的《漢語彙記》譯本，根據「英圖原稿」對稿本內容做出的修改和增補，應該有一定的價值。

六、結語

馬若瑟在撰寫《漢語彙記》後於 1728 年底把一份原稿寄回歐洲，請傅爾蒙替他安排出版。但是，正如雷慕沙所說，傅爾蒙在「可恥心態」(*fâcheuse disposition d'esprits*) 的驅使下，「通過不完整及表面化的分析隱藏了〔該書〕價值，甚至給

⁹² Francisco Varo, *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 pp. 85, 95.

⁹³ Christoph Harbsmeier,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7.1, eds. Joseph Needham & Kenneth Robin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6.

⁹⁴ 見王建勤，〈馬若瑟漢語習得觀今釋〉，《語言教學與研究》，5（北京：2012），頁 40-47；劉亞輝，〈馬若瑟《漢語彙記》中的語法化、詞彙化意識——以“以”的研究為例〉，《漢語學習》，1（延吉：2015），頁 93-100。

予錯誤的概念」，⁹⁵ 貶低《漢語彙記》的學術價值，阻礙它的刊行。漢學家何莫邪 (Christoph Harbsmeier) 極不同意傅爾蒙對《漢語彙記》的評價，指出儘管傅氏多方駁斥該書，聲稱它「明顯不如他本人的作品」(distinctly inferior to his own work)，事實上，馬氏的語法書乃「一項成熟的學術研究……而且——正如中國諺語所言——傅爾蒙的努力根本『不可同日而言』」。 ⁹⁶ 幸好馬氏的著作並沒有因為傅氏的行為而煙銷灰滅，因為雷慕沙在十九世紀初於巴黎皇家圖書館裡重新發現了另一份原始稿本。後來此原稿的抄本更於 1831 年透過馬六甲英華書院首次刊行，使這本「開創全新方法，或者可以說他的鑽研使所有方法都顯得多此一舉」的漢語語法書終於可以面世，⁹⁷ 惠澤希望學習漢語的歐美人士。

本文第二節探討第一份《漢語彙記》原始稿本無法刊行的因由，釐清了傅爾蒙在此歷史事件裡所扮演的角色；第三節至第五節檢視現藏於大英圖書館的一份原稿，透過與傅爾蒙藏本和現存於法國國家圖書館的另一份原稿的對比，提出了一些有關原稿總數、時序、流傳和內容的發現和觀點；部分與考狄、龍伯格和李真等人的看法及推論有異。具體而言，「英圖原稿」對《漢語彙記》的原稿研究有如下幾方面的重要性：

(一) 原稿數量：透過比較「英圖原稿」與「法圖原稿」以及傅爾蒙關於他手上稿本之描述，我們可以確認馬若瑟親自參與撰寫的稿本數量。這一點本文第三節已經解決——考狄等人的推論是不正確的，「英圖原稿」並非馬若瑟當年寄給傅爾蒙的稿本，而是另外一份稍微不同的原稿之殘本。換句話說，《漢語彙記》起碼有三份原始稿本。

(二) 原稿時序：「英圖原稿」對研究三份已知原稿在時間上的先後有決定性的作用。這一點本文第三節末段也有了可靠的推論——在比較過「英圖原稿」、「法圖原稿」和傅爾蒙藏本的編碼、內容和流傳差異後，我們可以推論「法圖原稿」應該是最早的原始稿本，然後是「英圖原稿」，最後才是作者希望用於刊行的傅爾蒙藏本。

⁹⁵ Jean-Pierre Abel-Rémusat,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auctore P. Premare," p. 537. 原文："...ait dissimulé la valeur, et donné même une idée fausse, par une analyse incomplète et sophistique."

⁹⁶ Christoph Harbsmeier,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7.1, p. 16.

⁹⁷ Jean-Pierre Abel-Rémusat, *Nouveaux mélanges asiatiques*, vol. 2, p. 270. 原文："l'auteur s'est créé une méthode toute nouvelle, ou plutôt il a cherché à rendre toute méthode superflue..."

（三）原稿流傳：透過細心檢閱「英圖原稿」及相關史料，我們可以探索該稿本的流傳歷史。這一點本文第四節取得了一些突破——「英圖原稿」頁面上的藏書印鑒和一些原始資料確認了法國傳教士蒙輓為此稿本早期的藏者，更可能是它到達歐洲後的第一位收藏者。這個發現把「英圖原稿」的流傳歷史向前推了好幾十年，但仍然無法勾勒出全貌，只能期望將來的研究可以取得更新的進展。

（四）原稿內容：「英圖原稿」可以改進及充實此書原稿的文本。這一點本文第五節提出了一些點題式的論述——「英圖原稿」在文本上多處的修改和補充及不見於「法圖原稿」的第一部第三章可以優化和豐富此書原稿的文本，使其更接近原作者的最終定稿，亦可以為未來可能出版全新譯本提供比現有刊本更可靠的稿本。

（責任校對：廖安婷）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綸音特典》*Lunyin tedian*，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年間刊本 Faguo guojia tushuguan cang Qing Kangxi nianjian kanben。

何世貞 He Shizhen，〈崇正必辯〉*Chongzheng bibian*，清康熙年間刊本 Qing Kangxi nianjian kanben，<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722306>，2021 年 8 月 1 日下載。

馬若瑟 Joseph Prémare，〈經傳議論〉*Jingzhuan yilun*，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九年 (1710) 稿本 Faguo guojia tushuguan cang Qing Kangxi sishijiu nian (1710) gaoben，MS Chinois 7164。

Abel-Rémusat, Jean-Pierre. *Élément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1822.

_____. *Essai sur la langue et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s*. Paris: Treuttel et Wurtz, 1811.

_____. “Notitia linguæ sinicæ, auctore P. Premare,” *Journal des Savans*, Sep. 1831, pp. 537-545.

_____. *Nouveaux mélanges asiatiques*, vol. 2. Paris: Schubart et Heideloff, 1829.

Aimé-Martin, M. L. (ed.).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concernant l’Asie, l’Afrique et l’Amérique*, vol. 3, *Chine*. Paris: Panthéon, 1838.

Baillargeon, Noël. “Montigny, François de,” in G. W. Brown et al. (eds.), *Dictionary of Canadian Biography*, vol. 3, 1741 to 1770.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4, pp. 469-470.

Coblin, W. South & Joseph A. Levi (eds.). *Francisco Varo’s Grammar of the Mandarin Language, 1703: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0.

Cordier, Henri. *Bibliotheca sinica: 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à l’Empire chinois*, vol. 3, fasc. 1.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e & Américaine, 1906.

Fourmont, Étienne. *Catalogue des ouvrages de Monsieur Fourmont l’aîné*. Amsterdam: publisher unknown, 1731.

_____. “Copie de la lettre de M. Fourmont l’aîné à Monsieur l’Abbé Bignon du Samedi, 4. Février 1730,” in Étienne Fourmont et al., *Papiers d’Étienne, Michel et Claude-Louis Fourmont*, vol. 31.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NAF 8974.

- _____. *Linguae Sinarum mandarinicae hieroglyphicae grammatica duplex, latinè, & cum characteribus Sinensium*. Paris: Lutetiae Parisiorum, 1742.
- _____. *Meditationes Sinicae*. Paris: Lutetiae Parisiorum, 1737.
- Johnson, Samuel. *The Works of Samuel Johnson*, vol. 4. Oxford: Talboys & Wheeler, 1825.
- Kidd, Samuel. Letter, Samuel to LMS, 7 Mar. 1831, Singapore.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Archive.
- Klaproth, J. H. (Julius Heinrich). *Catalogue des livres imprimés, des manuscrits et des ouvrages chinois, tartares, japonais, etc., composant la bibliothèque de feu M. Klaproth*. Paris: R. Merlin, 1839.
- Launay, Adrien.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étrangères*, vol. 1. Paris: Téqui, 1894.
- Macdonnel, David Evans. *A Dictionary of Select and Popular Quotations*, 4th American ed. Philadelphia: A. Finley, 1824.
- Montigny, (François) de et al. *Relation de la mission du Missisipi du Seminaire de Québec en 1700*. Nouvelle York: Cramoisy de Jean-Marie Shea, 1861.
- Morrison, Eliza.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 2. London: Longman, 1839.
- Prémare, Joseph. *Correspondance du R. P. Joseph-Henri de Prémare, missionnaire jésuite en Chine, et de l'abbé Jean-Paul Bignon, bibliothécaire du roi, avec Fourmont l'aîné, professeur au Collège royal*.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MS Français 15195.
- _____.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Canton: 1728).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MSS Orient. Chinois 9259.
- _____.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Canton: c. 1728). London: British Library, O/C ADD. 11707.
- (Querboeuf, Y. M. M.).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Nouvelle édition: Mémoires de la Chine*, vol. 16. Toulouse: Noël-Étienne Sens, 1810.
- Richelet, Pierre. *Nouveau dictionnaire françois*, vol. 1. Cologne: Jean François Gaillard, 1694.
- S. Pierre, François Gonzales de (San Pedro, Francisco González de). *Relation de la nouvelle persecution de la Chine jusqu'à la mort du Cardinal de Tournon*. Paris (?): publisher unknown, 1714.
- S. R. (sic). "Biographical Notice of Père Joseph Prémare, Translated from Rémusat's *Nouveaux mélanges asiatique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0.12, 1841, pp. 668-675.

Varo, Francisco. *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 compuesto por el M. R. P. fr. Francisco Varo de la sagrada Orden de N. P. S. Domingo*. Canton: publisher unknown, 1703.

二、近人論著

- 王建勤 Wang Jianqin, 〈馬若瑟漢語習得觀今釋〉“Ma Ruose Hanyu xideguan jinshi”, 《語言教學與研究》*Yuyan jiaoxue yu yanjiu*, 5, 北京 Beijing: 2012, 頁 40-47。
- 李 真 Li Zhen, 〈馬若瑟 (Joseph de Prémare, S.J.): 生平、拉丁語漢語語法書及學術成就鉤沉〉“Ma Ruose (Joseph de Prémare, S.J.): shengping, Ladingyu Hanyu yufashu ji xueshu chengjiu gouchen”, 《拉丁語言文化研究》*Lading yuyan wenhua yanjiu*, 1, 北京 Beijing: 2013, 頁 58-101。
- _____, 〈馬若瑟語言研究代表作《漢語筭記》之版本流變考〉“Ma Ruose yuyan yanjiu daibiaozuo Hanyu zhaji zhi banben liubian kao”, 《北京行政學院學報》*Beijing xingzheng xueyuan xuebao*, 2, 北京 Beijing: 2013, 頁 118-123。
- _____, 《馬若瑟《漢語筭記》研究》*Ma Ruose Hanyu zhaji yanjiu*, 北京 Beijing: 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 2014。
- _____, 〈18 世紀來華傳教士對中國古代修辭學的傳播——以馬若瑟《漢語筭記》為例〉“18 shiji lai Hua chuanjiaoshi dui Zhongguo gudai xiucixue de chuanbo: yi Ma Ruose Hanyu zhaji wei li”, 《北京行政學院學報》*Beijing xingzheng xueyuan xuebao*, 5, 北京 Beijing: 2017, 頁 121-128。
- 肖清和 Xiao Qinghe, 〈禮物與明末清初天主教的適應策略〉“Liwu yu Mingmo Qingchu Tianzhujiao de shiying celue”, 《東嶽論壇》*Dongyue luntan*, 34.3, 濟南 Jinan: 2013, 頁 81-94。
- 柯保羅 Paul Kua, 〈馬若瑟《漢語筭記》的抄本和刊本新探〉“Ma Ruose Hanyu zhaji de chaoben he kanben xintan”, 《漢學研究》*Hanxue yanjiu*, 39.1, 臺北 Taipei: 2021, 頁 161-206。
- 莫東寅 Mo Dongyin, 《漢學發達史》*Hanxue fadashi*, 北京 Beijing: 文化出版社 Wenhua chubanshe, 1949。
- 劉亞輝 Liu Yahui, 〈馬若瑟《漢語筭記》中的語法化、詞彙化意識——以“以”的研究為例〉“Ma Ruose Hanyu zhaji zhong de yufahua, cihuihua yishi: yi ‘yi’ de yanjiu wei li”, 《漢語學習》*Hanyu xuexi*, 1, 延吉 Yanji: 2015, 頁 93-100。
- 韓 琦 Han Qi, 〈姍姍來遲的“西洋消息”: 1709 年教皇致康熙信到達宮廷始末〉“Shanshanlaichi de ‘xiyang xiaoxi’: 1709 nian jiaohuang zhi Kangxi xin daoda gongting shimo”, 《文化雜誌 RC》*Wenhua zazhi RC*, 55, 澳門 Macau: 2005, 頁 1-14。

- _____, 〈南巡、傳教士和外交——兼論康熙對禮儀之爭和教廷特使多羅來華的反應〉“Nanxun, chuanjiaoshi he waijiao: jianlun Kangxi dui liyizhizheng he jiaoting teshi Duoluo lai Hua de fanying”, 《文化雜誌 RC》 *Wenhua zazhi RC*, 102, 澳門 Macau : 2018, 頁 56-65。
- 何群雄 He Qunxiong 編, 《J. プレマールおよびその『中国語ノート』》 *J. Premāru oyobi sono Chūgokugo nōto*, 東京 Tokyo : 三元社 Sangensha, 2002。
- Harbsmeier, Christoph.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7.1, eds. Joseph Needham & Kenneth Robin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Jones, Linda C. “Nicolas Foucault and the Quapaws,” *The Arkansas Historical Quarterly*, 75.1, 2016, pp. 4-26.
- Kua, Paul. “Prémare’s *Notitia linguæ sinicæ*, 1728-1893: The Journey of a Language Textbook,” *East Asian Publishing and Society*, 10.2, 2020, pp. 159-200.
- Lundbæk, Knud. *Joseph de Prémare, 1666-1736, S.J.: Chinese Philology and Figurism*. Aarhus: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1991.
- Stumpf, Kilian, Paul Rule & Claudia von Collani (eds.). *The Acta Pekinensia or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Maillard de Tournon Legation*.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2019. doi: 10.1163/9789004396579
- Walravens, Hartmut. *Julius Klaproth (1783-1835), Leben und Werk*.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1999.
- Wilkinson, Endymion Porter. *Chinese History: A Manual, Revised and Enlarg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0.

The Original Manuscript of *Notitia linguæ sinicæ* in the British Library and Manuscript Copies, Circulation, and Contents

Paul Kua

Department of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kua@oxon.org

ABSTRACT

French Jesuit Joseph Prémare (1666-1736) arrived in China in the late 17th century as a missionary; and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 while exiled to Canton by the Qing court, he drafted *Notitia linguæ sinicæ*, his *magnum opus* intended to help Europeans learn Chinese. His hope to have this published in Europe was realized a century later and only in Asia, partly due to efforts to sabotage it by Étienne Fourmont (1683-1745), to whom Prémare had sent the manuscript. In recent years, scholars East and West have shown interest in the various manuscripts and publications of the work and have issued articles and even monographs with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this topic, supplementing the already rich studies of earlier, mostly Western, sinologists.

This paper first sorts out the history surrounding the original manuscript sent to Fourmont; then examines the original manuscript currently held by the British Library; and offers alternative views and fills knowledge gaps in past studies by Henri Cordier (1849-1925), Knud Lundbæk (1912-1995) and Li Zhen 李真 on various aspects of manuscript studies related to this work. Specifically, this paper

1. concludes that the British Library manuscript is not an incomplete version of the one received by Fourmont, as contended in earlier research, but fragments of a distinct third manuscript;
2. deduces that this British manuscript comes between the copy received by Fourmont, i.e., the most recent, and that which is currently held in th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i.e., the oldest;
3. identifies François Montigny (1669-1742) as the earlier owner of the British manuscript, before it was owned by Heinrich Julius Klaproth (1783-1835), and then

purchased by the British Museum; and

4. suggests that the British manuscript can enrich the known texts of this work, with a new chapter and some improvements, and can provide a better manuscript for a possible new translation of the book.

Key words: Joseph Prémare, *Notitia linguæ sinicae*, Étienne Fourmont, Jean-Pierre Abel-Rémusat, François Montigny, manuscript studies

Le manuscrit original du *Notitia linguæ sinicæ* de la Bibliothèque britannique, des copies dudit manuscrit, de leur circulation et de leurs contenus

Le jésuite français Joseph Prémare (1666-1736) arriva en Chine à la fin du XVII^e siècle pour évangéliser la population. Lorsqu'il fut exilé à Guangzhou, il rédigea le *Notitia linguæ sinicæ* dans l'attention d'aider les Européens à apprendre le mandarin. Le manuscrit achevé, Prémare l'expédia à Paris et demanda à Étienne Fourmont (1683-1745) de le publier. Mais il fallut attendre un siècle pour voir l'apparition de cet ouvrage en Asie. La première partie de cet article présente le cadre historique du premier manuscrit avant d'en examiner un autre qui se trouve à la Bibliothèque britannique. Par la suite, l'auteur expose de nouvelles découvertes et son point de vue sur des questions concernant le nombre de copies de ce manuscrit, leur circulation et leur contenu. Cet article apporte des éléments qui permettent d'enrichir ou rectifier les études antérieures.

Mots clés : Joseph Prémare, *Notitia linguæ sinicæ*, Étienne Fourmont, Jean-Pierre Abel-Rémusat, François de Montigny, études de manuscrits

大英図書館所蔵『漢語筭記』オリジナル原稿と 原稿数、流通、内容

フランスのイエズス会修道士プレマール（馬若瑟、1666-1736）は、十七世紀末中国に着いて伝道を行い、十八世紀末、清朝政府に広州へ追放された時、『漢語筭記』を書いた。プレマールは西洋人の中国語の習得に役立てるために書いたこの本を完成後すぐにパリに送り、フルモン（傅爾蒙、1683-1745）にヨーロッパで刊行することを頼んだ。しかし、この願いが実現されたのは残念ながら一世紀後のアジアであった。本稿では、まず改めて初出のオリジナル原稿の歴史的背景を整理し、現在、大英図書館に所蔵されているもう一つのオリジナル原稿を精読し、原稿の数、流通の歴史、原稿内容の複数の問題について考察し、幾つかの発見と視点を提示する。そして、先行研究の補充と修正を行う。

キーワード : プレマール（馬若瑟）、『漢語筭記』、フルモン（傅爾蒙）、レミュザ（雷慕沙）、フランシス・モンティニー（蒙覬）、原稿研究

Das Originalmanuskript von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in der British Library und seine Publikations- und Rezeptionsgeschichte

Dieser Artikel diskutiert die Rezeptionsgeschichte des Originalmanuskripts der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von Joseph Prémare (1666-1736) in der British Library. Der französische Jesuit Prémare weilte im späten 17. und frühen 18. Jahrhundert in China, wo er im Exil in Canton die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sein *magnum opus*, verfasste. Dieses Werk wurde, entgegen seiner durch Étienne Fourmont (1683-1745), dem er das Manuskript gesandt hatte, sabotierten Hoffnung, in Europa publiziert zu werden, erst ein Jahrhundert später in Asien veröffentlicht. In diesem Artikel werden die Geschichte der verschiedenen Originalmanuskripte, besonders desjenigen in der British Library und die Transmissionsgeschichte weiterer Manuskripte diskutiert; wichtige Lücken in der Rezeptionsgeschichte der *Notitia* und ihrer Forschungsgeschichte werden gefüllt.

Key Wörter: Joseph Prémare,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Étienne Fourmont, Jean-Pierre Abel-Rémusat, François Montigny, Manuskriptstudien

(收稿日期：2020. 4. 8；修正稿日期：2020. 7. 24；通過刊登日期：2020. 9. 29)

